

1、小编希望和所有热爱生活，追求卓越的人成为朋友，小编：QQ 和微信 491256034 备注书友！小编有 300 多万册电子书。您也可以在微信上呼唤我 放心，绝对不是微商，看我以前发的朋友圈，你就能看得出来的。

2、扫面下方二维码，关注我的公众号，回复电子书，既可以看到我这里的书单，回复对应的数字，我就能发给你，小编每天都往里更新 10 本左右，如果没有你想要的书籍，你给我留言，我在单独的发给你。

3、为了方便书友朋友找书和看书，小编自己做了一个电子书下载网站，网址：  
<http://www.ireadweek.com>

4、小编自己组建的 QQ 群：550338315



扫此二维码加我微信好友



扫此二维码，添加我的微信公众号，  
查看我的书单

在一场军事政变中阅读柏拉图

《纽约时报》2014 年度书评

纽约时报中文网编辑部 编

本书由“行行”整理，如果你不知道读什么书或者想获得更多免费电子书请加小编微信或

QQ: 491256034 小编也和结交一些喜欢读书的朋友 或者关注小编个人微信公众号 id: d716-716 为了方便书友朋友找书和看书, 小编自己做了一个电子书下载网站, 网址: [www.ireadweek.com](http://www.ireadweek.com) QQ 群: 550338315

## 版权信息

在一场军事政变中阅读柏拉图——《纽约时报》2014 年度书评（纽约时报特辑）

纽约时报中文网编辑部 编

©纽约时报中文网 2015

本书版权为纽约时报中文网所有, 授权浙江出版集团数字传媒有限公司出版发行电子版, 未经书面授权, 不得在任何地区以任何方式转载、翻印、仿制或节录本书文字或图片。

DNA-BN: ECFD-N00005333-20150122

最后修订: 2015 年 1 月 27 日

制作: 曾维嘉

出版: 浙江出版集团数字传媒有限公司

浙江 杭州 体育场路 347 号

互联网出版许可证: 新出网证(浙)字 10 号

电子邮箱: [cb@bookdna.cn](mailto:cb@bookdna.cn)

网 址: [www.bookdna.cn](http://www.bookdna.cn)

BookDNA 是浙江出版联合集团旗下电子书出版机构, 为作者提供电子书出版服务。

如您发现本书内容错讹, 敬请指正, 以便新版修订。

©Zhejiang Publishing United Group Digital Media CO.,LTD,2015

No.347 Tiyuchang Road, Hangzhou 310006 P.R.C.

cb@bookdna.cn

www.bookdna.cn

## 目录

沈从文的后半生：总而言之不醒

“恋殖”与“人心未回归”的真相

《独裁者手册》：天下乌鸦不一般黑

中国人民究竟有几个老朋友？

被收养华裔少女的爱与痛

麦家笔下中国间谍小说的心理焦虑

帕蒂·史密斯评村上春树新作

艾希曼不是平庸，而是恶

希拉里新作微妙展现外交决策之艰

千禧一代是怎样改变了中东

究竟什么才是真正的自由主义

与亚当·斯密和卡尔·马克思较量

《俄罗斯人》带我们认识普京时代

新书讲述日本民族的坚忍与顽强

韩国如何用流行文化征服了世界？

资深新闻记者推荐关于本行的好书

棱镜门回忆录《无处可藏》惹争议

托马斯·品钦笔下的互联网牢笼

办公室隔间的秘密历史

向“工作狂”职场文化开炮

罗琳侦探小说揭出版业内幕

在一场军事政变中阅读柏拉图

除鲍勃·迪伦，他们的人生别无他物

“我就在这儿，我是你的男人”

《纽约时报》2014 年 100 本值得关注的书

\* \* \*

扫描 QR 二维码，

免费下载纽约时报中文网

iPhone / iPad App

沈从文的后半生：总而言之不醒

李静睿 2014 年 07 月 28 日

去年在纽约的时候我见过一次汉学家金介甫（Jeffrey C.Kinkley），他是《沈从文传》（*The Odyssey of Shen Congwen*）的作者。1977 年金介甫以《沈从文笔下的中国》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后来经过几次扩充，成为公认最为详尽的沈从文传记。

金介甫在纽约皇后区一个小大学里教书，办公室大概只有四五个平方，开着极小的小窗，我在排山倒海的资料中勉强坐了下来。他六十几岁，秃顶，离婚，独自住在新泽西州，每次往返学校需要七个小时，需要开车转火车转地铁再转公交车。聊到最后，我忍不住抛弃礼貌，去关心他的生活，问他那本《沈从文传》1999 年引进中文版时到底拿了多少钱，金介甫茫然地说：“没有版税啊，就是出版社请我吃了两顿饭。”然后我又问 1987 年在美国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英文版在美国卖了多少本，他高兴起来：“五百本！这是汉学界的畅销书！”坐车回家的时候我想，这个人真适合为沈从文写传。

沈从文是中国 1920—1930 年代富于盛名的小说家，1988 年他去世时《纽约时报》讣告称他为“中国文学与独立思想的桂冠式人物”。他的代表作品包括小说《边城》与《长河》，以及一系列其他形态丰富的短篇小说；1949 年政权更迭后，他转入文物研究，创作《中国古代服饰研究》，至去世再未有小说公开发表。沈从文一生与时局交缠，他身上凝聚着个体与国

家之间的冲突感。

金介甫的《沈从文传》以沈从文的文学创作和充满湘西特色的作品为主要研究对象，金介甫写道：“（沈从文）在现代中国的道德群体中表达出自己的乡土意识”，并将沈从文誉为与契诃夫比肩的作家。然而，政治的问题随之而来。这位 1949 年后在事实上承认了中国共产党地位的作家面临着个人创作与为意识形态写作的冲突，随后又因接受政治改造而逐渐缄默。

2014 年 7 月，由复旦大学文学系教授张新颖撰写的《沈从文的后半生：1948—1988》出版，更聚焦于沈从文与政治交缠放弃小说书写后的岁月。这部新传既提供了一些很少被人提及的资料，如作者本人在书中所说，他要写的是“动荡年代里他个人漫长的内心生活”。

张新颖从 1948 年起笔，中国大变在前，老朋友们大都兴奋乐观，只有沈从文，在教育家杨振声的霁清轩中消夏时，还写了篇《中国往何处去》：“中国往何处去？往毁灭而已……即结束，我们为下一代准备的，却恐将是一分不折不扣的‘集权’！”到了 1949 年，沈从文已被郭沫若划定为“粉红色作家”，他精神失常，自杀未遂，又给远在香港的表侄、画家黄永玉写信：“北京傅作义都已成瓮中之鳖。长安街大树均已锯去以利飞机起落。城，三四日可下，根据过往恩怨，我准备含笑上绞架……”黄永玉只觉从文表叔夸张而幼稚。没多久，解放军真的进城，沈从文忙不迭夸他们“威严而和气”，劝黄永玉赶紧回来，“参加这一人类历史未有之值得为之献身工作”。这种矛盾几乎贯穿沈从文的后半生，他在时局的长河中顺流而下，自有逆流反抗的直觉，却又不断否定自己的直觉，他拿不准，所以独自一人坐在船上，更觉彷徨孤独。

沈从文是发自内心想改造自我。《沈从文的后半生》里写到 1949 年 9 月，沈从文给妻子张兆和写信，说自己在把“一只大而且旧的船作调头努力，扭过来了”，后来他写诗，又说自己“已得到一个完全新生”。但一个人无法全情投入自己本就怀疑的狂热，所以在毛泽东登上城楼那天，沈从文完成长诗《黄昏和午夜》：“城楼上大钟大鼓灰尘蒙蒙/沉没暗哑相对已半个世纪/帝国封建的种种，早成传说故事/慢慢在时间下退尽颜色/惟剩余点滴片段，保留在老人记忆中/当作生命迟暮的慰藉。”与之对比的是，诗人何其芳在几乎完全相同的时间段里，写了《我们最伟大的节日》：“是如此巨大的国家的诞生，是经过了如此长期的苦痛而又如此欢乐的诞生，就不能不像暴风雨一样打击着敌人，像雷一样发出震动世界的声音……”沈从文没法和自己的情感世界做这样彻底的告别，他的确努力把船调头，但是撞上暗礁，他失败了，所以在如火如荼的 1949 年之后，他停止了文学创作，埋进出土文物的汪洋大海，只有这个世界让他感觉安全。根据 2003 年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沈从文晚年口述》的记录，沈从文反反复复强调自己没有资格谈文学，“我的写作应该说是失败了”，因为自己“没有生活”，在那个时刻，可怕的不是整个世界都不知道他的价值，而是他自己也不知道，他以为自己早就过时。

妻子热烈地献身于新中国建设，连读初中的儿子都疑惑他为什么“老不进步”，觉得他“到博物馆弄古董，有什么意思”，家人爱他，却不理解他，沈从文只好从肖邦和贝多芬中寻找慰藉。他深夜写作，第二天又完全扔掉，既因恐惧，也因自卑，他当然不再是过去那个乡下人，连标点符号都不会用却觉得自己会超过契诃夫，但他也没有成为另外一个人，他留在了不能被改造的自我里，微弱抗拒，微弱挣扎。

《沈从文的后半生》中有他在位于北京郊外的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改造时的一段话：“天已接

近黄昏，天云如焚如烧，十分美观。我如同浮在这种笑语呼声中，一切如三十年前在军营中光景。生命封锁在躯壳里，一切隔离着，生命的火在沉默里燃烧，慢慢熄灭。搁下笔来快有两年了，在手中已完全失去意义。国家新生，个人如此萎悴，很离奇。”他搞不明白这个世界，也搞不明白自己。1952年沈从文去四川内江参加土改，在信里儿子描述当时批斗地主的情形：“实在是历史奇观。人人都若有一种不可解的力量在支配，进行时代所排定的程序……工作完毕，各自散去时，也大都沉默无声，依然在山道上成一道长长的行列，逐渐消失到丘陵竹树间。”沈从文自己其实也是如此，被不可解的力量支配着进行时代所排定的程序，与当时的大部分人尚处于政治昏睡状态不同的是，他捕捉到了这一点。多年前沈从文就在《从文自传》里写过，自己不想明白道理，却永远为现象所倾心，他的文字准确描述了政治风暴之中众人的茫然麻木，却全无判断，因他本就糊涂，不知如何判断，现在看起来，他的这些零碎文字成为了那个时代的脚注，不重要，但有总是比没有更好。

我不喜欢总是试图从一个人身上总结时代，因为任何时代里都有那些格格不入的人，在我看来，1949年之后，中国大陆并没有第二个和沈从文一样有着剧烈自我冲突的知识分子。在五十年代中晚期，他写了一些赞颂毛泽东和共产党的文章，新政权真心让他兴奋，但好友丁西林和张奚若请他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时，沈从文还是说自己“没兴趣”。毛泽东和周恩来曾经鼓励沈从文重新写作，1961年他在井冈山住了三个月，雄心勃勃要写一篇关于共产党员的长篇小说，但是什么都写不出来，灰溜溜下了山。“人民”这个词语被作家们高度偶像化，让向来书写“个人”的沈从文无所适从，1949年后他写过一篇短篇小说叫《老同志》，写一个劳动模范炊事员，沈从文改了七稿，最后的结尾是“在任何地方……都有老同志一样的劳动人民，在无私无我地为建设国家而努力”，如果抹去作者名，这可能是当时任何一个作家的作品。当被限定为必须为“人民”写作的时候，沈从文丧失了他那迷人的文字天赋，后来他也感慨过，自己并不知道需要他写作的“人民”到底在哪里。

而在个体和国家的关系中，更实实在在是“国家”虐他千百遍，他还待“国家”如初恋。1956年沈从文写给大哥的信里说：“写小说算是全失败了，不容许妄想再抬头。近来文物工作也搞得不好，如又弄错，还不知到换什么工作会对国家有用一些。”他无比积极热心要为国家做点贡献，但在那一年的局势之下，他的“贡献”却是忙着给《红楼梦》写了几百条注释，倾心于研究诸如妙玉的茶具之类可能“国家”和“人民”都会觉得可笑的问题。《沈从文的后半生：1948—1988》记录，当时历史博物馆的副馆长说他“终日玩花朵朵，只是个人爱好，一天不知道干些什么事”，沈从文在历史博物馆待了二十几年，最后要调入社科院，馆长的意思是要走就走，无人留他，他的单位就像国家的缩小版，其实并不需要他。但沈从文的特别之处在于，在总是遭遇这些屈辱的下半生里，他并没有活得屈辱，他在花花朵朵坛坛罐罐里获得了另外的自由和荣誉，每个人的生命中，都会有一点任何时代与国家都夺不走的光，沈从文抓住了它，这支撑着他活了下来，活到可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八十年代。

瑞典汉学家马悦然（Goran Malmqvist）曾经公开说过，1987年沈从文进入了诺奖评选的最后名单，但那一年得奖的人是诗人约瑟夫·布罗茨基（Joseph Brodsky）。布罗茨基做了一个名为《美学高于伦理》的获奖演说词：“个人的美学经验愈丰富，他的趣味愈坚定，他的道德选择就愈准确，他就愈自由——尽管他有可能愈不幸。”沈从文没有说过这样的话，但这也如同他的人生。早在1930年代蔡元培提出“以美育代替宗教”的口号时，沈从文就为这条口号加上附款：“也要代替政治”。在1949年前夕，革命吸引不了他，他喜欢的那些词语，是美感、博爱、道德、自由与和平。因为美应该凌驾一切，沈从文和布罗茨基一样，并不愿意展示自己的苦难，在布罗茨基流亡美国后，他从来不愿意提及苏联以社会寄生虫的罪名对

他进行指控，判处他去俄罗斯北方劳改的经历，他还在课堂上建议自己的学生要不惜一切代价避免赋予自己受害者的地位。沈从文并不这样清晰地论证道理，但他总有一种直觉，在1980年访美的三个半月里，他做了23场讲座，明知听众更希望听到他个人的经历，那些关于苦难的证词，但他的讲座依然一半关于文学，一半关于文物，通通关于美。这才是沈从文的灵魂所在，和它们比起来，苦难并非那样重要。

1957年5月1日，沈从文在上海，他画了一幅速写“六点钟所见”，画旁写着“艨艟船还在作梦，在大海中飘动。原来是红旗的海，歌声的海，锣鼓的海。（总而言之不醒。）”在众生昏迷于一些大而化之的概念之时，沈从文选择沉浸在自己的小小世界里，他总而言之不醒，这就是沈从文的后半生。

李静睿是作家，著有短篇小说集《小城故事》和随笔集《愿你的道路漫长》等。

“恋殖”与“人心未回归”的真相

章诗依 2014年09月22日

世人眼中，香港是一座非常西方化的城市。但在香港呆上一段时间，就会发现，日常生活中的香港，其实有着很中国的一面，它保留了许多内地都已褪色甚至不存在的中国传统文化和习俗，比如人气旺盛的春节庙会、热烈的中秋节舞火龙、已经坚持了24年的全港旧体诗词创作大赛等。然而，用内地一些爱国者的眼睛看过去，香港仍是一座散发着殖民地腐朽气息的城市。这一多少有些矛盾的现象反映了当下香港的一个困境：香港人在文化认同与国家认同上的冲突。很多香港人，在文化意义上认同自己是中国人，但他们难以认同共产党政权，由此影响了国家认同。

北京显然也被这一现象所困扰。不过它认为问题出在香港人“人心未回归”，于是试图推动在香港中小学里开展“国民教育”，导致香港市民激烈的反弹，2012年八九月间，爆发了十几万人的大游行，“国民教育”不得不胎死腹中。香港人胜利了，但也更加深了北京对香港的不信任。

同一年的七一游行，赫然出现了港英时期代表香港的龙狮旗，也强烈刺激了北京与内地民众的神经，媒体上开始出现“恋殖”一词，用以描述部分香港人怀念港英殖民时代的情绪。

香港左派媒体自然对所谓“恋殖”现象大张旗鼓地口诛笔伐，本已在香港衰落的后殖民研究也借势再度成为显学。今年七月的香港书展上，香港牛津出版社推出的《殖民家国外》一书，不待书展结束，已经卖到脱销。该书由多篇文化、政治评论文章合集而成，关于后殖民研究



的内容，只占全书的四分之一，但书名显示这部分内容恰是书的卖点所在。

《殖民家国外》的作者罗永生，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担任过香港中文大学学生会会长，是当时主张香港“民主回归”的代表人物之一。这一主张支持香港回归中国，但认为要将香港建成中国土地上一个民主化的试点。他现为岭南大学文化研究系副教授，据其自述，1982年，撒切尔夫人经北京到香港访问时，他是首批跑到启德机场抗议的学生之一，因为撒切尔夫人在北京声称“三个（不平等）条约”有效。罗永生这一代大学生，曾被《人民日报》赞誉为爱国青年。

罗永生是香港学术界坚持用后殖民主义研究框架来分析香港政治现状的学者之一。2007年，香港牛津出版社曾出版过他的《殖民无间道》一书，该书最引人注目的见解，是将英国统治香港的手法，做了“勾结式殖民主义”这样带有强烈批判色彩的概括。其核心含义，是指英国殖民政府吸纳香港少数华人精英，培养其对宗主国的效忠，然后利用这部分少数华人，把香港建成一个环绕这些高等华人的奴性结构。回归之后，这种勾结式的殖民结构得以保留，只不过，勾结的双方，置换为香港特区政府与亲北京的大商家。

罗永生认为，北京中央政府出于“平稳过渡”考虑而刻意延续的这种殖民时期的勾结式结构，是今日香港许多政治与社会弊病的症结所在。这些弊病主要包括：特区政府施政的认受性低；即使温和的社会改革也受到大商家的阻挠而难以推进，一些必要的福利改革被指为走向“社会主义”。他认为，只有在香港实行真正的民主选举，才能打破这种勾结式的政治结构，也才能改变殖民统治给香港人遗留的奴性心理。

在新书《殖民家国外》中，“勾结式殖民主义”仍是罗永生分析今日香港社会政治现状所使用的武器，只是，他要处理的具体议题则比七年前复杂、尖锐得多，而他也将自己的武器改装得更为锋利。今日香港，社会撕裂加剧，以争取“真普选”为目标的占领中环运动箭在弦上，政治的未来充满了不确定性。

“恋殖”是此书重点处理的问题之一。罗永生把香港人的恋殖现象分为两种，一种是普通香港人基于对回归后现实的不满产生的怀旧心理，另一种则是部分香港知识分子为了抗拒以国族主义面目出现的天朝主义，采取的策略性恋殖，也即为了反击回归后北京对香港核心价值的侵蚀，托古改制，故意将殖民时代说成一个善治的神话。在罗永生看来，恋殖现象产生的原因，十足具有讽刺意味——它竟然根植于种种“反殖民”“去殖民”的讨伐行动。这些讨伐行动由亲北京的香港建制派发起。

这是“南辕北辙”成语的现代版。罗永生认为，本来，香港主权移交的起初十年，香港纵有风浪，政治身份认同并不是一个问题，因为人们认为基本法承诺的“一国两制”仍然在被实践中，即使是其中最为敏感的政治改革部分，也只有步伐快慢的争论，不存在信任崩溃的情况。而当香港人民民主政治意识上升，要求打破从殖民时代延续下来的勾结式政治结构时，既得利益的建制派却罔顾港人正常的政治诉求，把一切争议都上升为关于身份认同的对立，联系到对民族与国家的忠诚问题上，并把香港的民主政治争议上升为“敌我”矛盾。

正是在火力十足的批判声中，在种种对意识形态的控制举动中，真正的恋殖才被呼唤出来。这一逻辑，看似荒谬，却未必没有今天香港的客观现实做支撑。在网络上，流行着香港青年人这样的话语：英国人不会对我们说你们是狗是奴才，没有英国照顾你们早就完蛋了，英国

人没有强迫我们去颂扬女皇……凡此种种，都在为罗永生的分析提供佐证。事实上，打出龙狮旗的，正是香港的年轻一代。

关于香港的殖民地经验，是罗永生要处理的另一个问题。在对这一问题的处理中，他有力地回答了对香港人“人心未回归”的指控。

在书中的“‘不从国教’的香港”一文中，罗永生高声反对香港人“人心未回归”这一说法，认为这是把香港人看成了“有缺陷的中国人”，看成了所谓“失去了民族的根”的孤苦一群，需要进行补课、疗救。而罗永生认为，香港虽然是英国殖民地，但英国人没有针对香港人的“文化殖民”计划，更没有如英国统治马来西亚时期那样，刻意打压华人华文教育的“文化排斥”计划，因此，香港人根本就没有华人身份被殖民当局贬抑的状况。香港人的华人身份认同不存在问题。相反，香港人却有内地中国人从来没有过的在法治、自由及廉洁的社会下生活的体验，在近现代历史上，香港不但为花果飘零的中国传统文化提供了避难所，更难得地屡屡充当中国革命与争取民主运动的堡垒。

言下之意，殖民地经验不是香港人的原罪，香港人不需要救赎，更无须自卑。相反，香港人应该骄傲。

从这个前提出发，罗永生坚决反对以“国民教育”为名而以“党国教育”为实的人心改造工程，对于这盘热气腾腾地端到香港人面前的“大菜”，他回敬以这样的话：香港人不是因为受殖民宗主国英国的洗脑，才对“中国”的“国家认同”保持距离，而是因为他们的过去及现在，都曾客观地见证，无论是“中华民国”或“中华人民共和国”，都难以理所当然地成为他们能无条件地去认同的“中国”。相反，只要“党国”仍是现实，而真正从属于人民“国家”仍无奈地只是遥远的美好想象的时候，香港人仍然会更乐于活在“家国以外”。

《殖民家国外》罗永生著，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

章诗依为媒体人，常住香港。

《独裁者手册》：天下乌鸦不一般黑

刘瑜 2014 年 06 月 30 日

《独裁者手册》（The Dictator's Handbook）可真是一部典型的“标题党”作品。根据这个书名，这本书将手把手教会我们如何成为一个呼风唤雨的独裁者。真有这样的秘笈？原以为征服世界需要千军万马，现在看来只需要 42 元。

可是，掏钱买书之后，打开一读，我们就会发现自己“上当”了。这本书真正的标题似乎应该是《如何理解政治：一个三维的视角》。但是鉴于多数人一读到“三维”这个字眼就睡着了，所以，还是用个吸引眼球的书名、让人们先掏钱再说吧。

但事实上，由来自纽约大学的两位政治学学者布鲁斯·布鲁诺·德·梅斯基塔（Bruce Bueno de Mesquita）和阿拉斯泰尔·史密斯（Alastair Smith）出版于 2011 年的书旨在介绍一个理解政治的“三维视角”，并试图以之取代我们常见的“民主专制二分”视角。政治的哪三维？在作者看来，一切统治者掌握和维系权力都要面临三个集团：名义选择人；实际选择人；致胜联盟。所谓“名义选择人集团”，就是那些名义上有投票权的公民；实际选择人集团在某些国家可能是实际的投票人，在另一些国家则可能是党代表大会之类的机构；但这些都不那么重要，真正重要的是最后那个“致胜联盟”——即真正决定一个领导人上台还是下台的那些核心人物——他们可能是神秘的泰国将军，也可能是坐在珠帘后面的慈禧太后，还可能是当年为奥巴马投票的美国选民。如果必须用一句话来总结此书的中心思想，那就是：一个领导人，不管他身处什么样的制度，都只会讨好决定其输赢的那个“致胜联盟”。别幻想什么“为人民服务”了，政治就是“为致胜联盟服务”。

接下来，睡着的读者可以醒过来了——在介绍完他们的政治分析三维模型之后，作者的确提供了一套“统治攻略”。这个“攻略”非常简洁，比“三十六计”还简洁——它只有五条：

第一：让你的致胜联盟越小越好（容易收买和控制）；

第二：让你的名义选择人集团越大越好（备胎越多当然越好）；

第三：掌控收入的分配（无需解释）；

第四：支付给核心支持者刚好足够确保他们忠诚的钱（给多了就威胁到统治者自身）；

第五：不要从你的支持者的袋里挪钱去改善人民的生活（不要试图“为人民服务”，因为背叛“自己人”比背叛“人民”后果更不堪设想）。

总结起来就是：找到尽可能多的钱，给关键但尽可能少的人花。比如，利比里亚的前总统塞繆尔·卡尼翁·多伊（Samuel Kanyon Doe），这位在 1985 年刺杀了其前任，并将其心脏喂狗的“壮士”当权之后，无师自通地掌握了上述规则：他迅速控制了一家大橡胶公司、一家铁矿出口公司，并向远洋船只征收“登记管理费”，从而获取了巨大财源；然后他又用这个财源一举将士兵的工资从 85 美元涨到 250 美元。同时，他还将政府高层全部换成了本族人。尽管他诸多短视的政策导致这个国家经济崩溃、犯罪丛生、民不聊生，但是没关系，在这里，“致胜联盟”不是“民不聊生”里面的那个“民”，是政府高层与军队。

这个模型的确给我们理解从家庭、企业到政党、国家的组织运转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工具。小到家庭——宝宝想吃巧克力怎么办？家里人再多，他所需要的搞定的其实就是那个妈妈——那才是他的“致胜联盟”。大到一个专制政府——为什么罗伯特·加布里埃尔·穆加贝（Robert Gabriel Mugabe）把津巴布韦治理得一团糟却能“稳坐江山”？因为他们搞定了需要搞定的人。为什么光绪为了国家前途发动改革却死得那么惨？因为他得罪了自己的“致

胜联盟”。为什么联合国无法出兵叙利亚？因为英美搞不定常任理事国这个“致胜联盟”……

把这个模型运用到政治分析时，作者格外强调，这个攻略可不仅仅适用于专制国家或组织，在“找钱搞定致胜联盟”这一点上，民主国家也一样。美国国会的“猪肉政治”就是一个典型。对一个议员来说，本选区那些给他投票的民众就是他的“致胜联盟”。于是，各种“好处”源源不断地往本选区输送，至于这个选区是不是真的需要一个飞机场、这个超市是不是建在另一个选区更好、这笔钱也许路易斯安那赈灾更需要……我可管不了，因为路易斯安那的选民不会万里迢迢跑到这里给我投票。

那么，难道根据这个“三维模型”，专制和民主是一回事？写到这里，作者终于“背叛”了书名、露出了他们的“本来面目”：他们用了一章试图论证“天下乌鸦一般黑”，然后用了剩下的九章来论证“天下乌鸦不一般黑”。

在作者看来，专制和民主的逻辑是一样的，但同样的逻辑却导致完全不同的结果——原因在于，在专制和民主之下，致胜联盟的规模完全不同。在专制国家，致胜联盟往往很小——极端情况下，几个将军、某党派的核心人物或者某些宗教领袖就能决定谁在台上谁下来；但在民主国家，尽管致胜联盟和名义选择人之间也往往有巨大鸿沟，但其规模要大得多，比如，就奥巴马的上台而言，尽管有投票率、党派撕裂等因素，最后把他推上台的，就算没有上亿，也有几千万人了。

致胜联盟这种规模的差异会带来一系列政策和治理上的后果。致胜联盟规模小，意味着统治者往往只需要给联盟成员提供“私人好处”来获得或维系权力，无需通过公共服务和公共福利来维系权力——这就是掠夺型国家的起源；致胜联盟规模大，则意味着统治者只能通过公共服务和公共福利来争取权力，这是服务型国家的理由。由于即使在民主国家，致胜联盟也不等于“全体人民”，这种公共善的供给未必是均衡的：既然奥巴马的核心支持者是年轻人、有色人种、穷人和自由派知识分子，那么给富人减税、呼吁禁止堕胎、增加大学生学费或者推翻平权法案显然不会占据奥巴马议程的顶端。但是，当致胜联盟规模达到几千万乃至上亿人时，局部的“私”与整体的“公”已经相差不远。

为了说明“大致胜联盟”的治理优势，作者列举了一系列的案例。比如税收。与我们一般认定“民主的再分配冲动导致税收提高”的直觉不同，作者的研究表明，一般情况下，致胜联盟的规模越大，税收越低——这是因为高税收会得罪自己的致胜联盟。比如墨西哥，民主转型前后，边际税率以及政府收入占 GDP 比重都减少而不是增加了。但在“小致胜联盟国家”，致胜联盟所获得的好处从来主要不是来自于低税收，而是“私人好处”，所以政府很可能用高税收、逆累进或间接税的方式将穷人的钱转移到富人身上。再比如医疗卫生方面，作者的经验研究表明，对于控制婴儿死亡率，致胜联盟的规模比国家贫富程度影响更大，“成为富裕国家确实有助于挽救孩子的生命，但效果不如成为民主国家”。再比如饮用清洁用水，90%的洪都拉斯人能喝到清洁的水，却只有 44%的赤道几内亚人能喝到清洁的水——是因为洪都拉斯比赤道几内亚富很多吗？事实上赤道几内亚的人均 GDP 高得多，而且两个国家都在热带，都曾经是西班牙殖民地，导致差异的，在作者看来，是政治制度。大致胜联盟往往意味着统治者试图以更低的税收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所以书中总结道：民主是关于好想法的军备竞赛。

可以看出，作者试图抛弃“民主/专制”二分法来理解政治，代之以他们创造的“三维模型”，

但是绕了一大圈，他们似乎还是绕回了这个二分法。只不过，他们使用的语汇不再是“民主/专制”，而是“大致胜联盟/小致胜联盟”。

但是，因为致胜联盟规模较大，民主国家的公众从此就带上了护身符，可以一劳永逸享受统治者端上来的各种甜品吗？显然并非如此。不要忘记前面提及的“红五条”：不管民主制还是独裁制里的统治者，他们总在想方设法缩小致胜联盟、开拓财源、从“人民”手里向自己的致胜联盟输送利益——这就意味着，民主永远面临着被统治者扭曲成专制的可能性。事实上，民主国家无论历史上还是现实中，选区操控（缩小致胜联盟规模）、增税借债（扩大财源）以及猪肉政治（内部分赃）等等危险都一直存在。对此，在本书的开头，作者就讲了加州贝尔小城的腐败故事。在那个小镇，一共有3万6千多人，登记选民只有9000多人，市议会选举的投票率只有20%多，也就是2000多人，由于多党瓜分选票，导致一个议员只需要472票就可以当选。也就是说，在一个3万多人的小镇，只有400多人属于致胜联盟，搞定400多人就可以操控该市的各种政策，腐败随之而来也不足为奇了。但是，如果这个小城有更多的登记选民、选民中有更多出来投票呢？所以，如果专制是统治者缩小致胜联盟的结果，民主则是被统治者奋力扩大致胜联盟的结果。在民主和专制之间，隔着成千上万昏昏欲睡的人民。

同样，独裁者掌握了“找钱、分赃”的要诀之后也不可能从此高枕无忧。当多伊式的独裁者把经济搞糟到一定程度，除非有外援，否则独裁者用以支付给致胜联盟的“好处费”也逐渐失去来源。这时候，军队开始骚动，官僚集团也坐不住了，要么独裁政府被推翻，要么主动推动改革以扭转经济局面。

作为一个模型，此书也不是没有它的漏洞。比如，它对制度变革完全“经济人”的解释，排除了意识形态的和政治文化的因素；又比如，它解释共性的能力甚于解释差异——为什么独裁国家也会出现公共福利？为什么民主国家不同党派的政策取向会非常不同？再比如对一些关键观点，作者似乎是采取了例证法而没有提供更系统的论据。不过，作为一本由专业学术书籍改编成的半学术书籍，严密可能本来就不是它最核心的追求。但是有一类指责倒是可以理直气壮：一本名叫《独裁者手册》的书，写着写着就写成了《民主颂》，读者可不可以要求退钱？

刘瑜是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政治学系副教授，著有政治学著作《民主的细节》、《送你一颗子弹》、《观念的水位》等。

中国人民究竟有几个老朋友？

方可成 2014年06月19日

2012 年的全国两会上，我作为记者见到了政协委员周幼马。和他父亲马海德一样，他也有一双标志性的浓眉，在人群里很容易辨认出来。

对于我的采访请求，周幼马显得有些吃惊：“我父亲和我的故事，现在很少有人关心了。”我说，正因为少为人知，才更有重新讲述的必要。

生于 1943 年的周幼马是在延安窑洞里出生的第一个外国人。1936 年，经宋庆龄的推荐，他的父亲、美国医生马海德（Dr. George Hatem）和美国记者斯诺（Edgar Snow）一起前往红军的临时驻地保安，见到了毛泽东和周恩来。后来，斯诺写了著名的《西行漫记》（Red Star Over China），而马海德则留了下来，先后担任了八路军总卫生部顾问和毛泽东的保健医生，之后又成为第一个加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和中国共产党的外国人，也是唯一参加过红军、八路军、解放军的外国人。

1949 年中共建政后，马海德长期在基层从事消灭麻风病和性病的工作。1978 年，他成为全国政协委员。2008 年，周幼马接过了已经去世的父亲的接力棒，开始参加政协会议。

马海德和斯诺拥有一个共同的称谓：“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这个特殊的短语几乎是每一个中国人都熟知的。2012 年采访周幼马时，我的书稿《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已经接近完成。对他及其他相关人士的采访，后来成为我在《南方周末》发表报道之一，也成为书稿的一小部分素材。

之所以对“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这个话题感兴趣，并且要专门写一本书来讲述他们的故事，是因为我发现，中国大众对于这个短语有不少的误解。

最典型的误解，是认为“老朋友”都是专制政权的领袖或朋友。

2011 年阿拉伯之春期间，埃及前总统穆巴拉克和利比亚领袖卡扎菲政权相继倒台，中国互联网上流行一个段子：“当今世界三大濒危物种：大熊猫、金丝猴、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这个段子机智幽默，但毕竟有些以偏概全，甚至不符合事实。比如，卡扎菲并非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他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暧昧，为中共所不喜，更像是“台湾人民的老朋友”。

更重要的是，把“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简单化为专制政权的领袖或朋友，实际上大大忽略了历史的复杂性。

为了完成《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报道，借助接受中共领导的媒体《人民日报》的数据库，我对“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这个称呼进行了全面的检索和研究，最终确定了来自五大洲 123 个国家的 601 位老友。对这些老友的身份、经历及被称为老友的原因进行分析之后，我将他们分为四个代际：

斯诺和马海德是第一代老友的代表。他们在 1949 年之前来到中国，或是向世界介绍当时还很弱小的中共，或是在战场救死扶伤。当时，国民党才是执政党，日本人正在侵略中国，这批老友大多是理想主义者，他们报道官方禁止报道的话题，救助一度被视为异己、敌人的力量。2009 年村上春树获耶路撒冷文学奖时发表《鸡蛋与高墙》演讲时说：“假如这里有坚固

的高墙和撞墙破碎的鸡蛋，我总是站在鸡蛋一边。”所以我说，他们是站在“鸡蛋”在一边的人。后来，鸡蛋变成了高墙，这群人的命运也发生了令人唏嘘的变化。

1949 年中共建政之后登场的是第二批“老朋友”。在冷战的国际局势下，在国际舞台上能否“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更多成为判断是否老友的标准，因此这个时期的老朋友大多是社会主义阵营和第三世界国家的领导人，比如柬埔寨的西哈努克（Norodom Sihanouk）。

1972 年中日建交和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Henry Kissinger）访华，则标志着另一批为国家友谊破冰的老友出现。他们有的是民间外交使者，比如日本的清水正夫夫妇和他们的松山芭蕾舞团；有的则是政治人物，比如尼克松（Richard Nixon），这个在美国富有争议的总统，因为在中美建交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在中国始终享有良好的声誉。

改革开放之后，第四批老友帮助中国逐步融入世界主流秩序，登上国际舞台。最典型的例子当属为北京取得 2008 年奥运会主办权帮忙不少的前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Juan Antonio Samaranch）。

随着国际局势的风云变幻，这四代老友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完全不同。

《人民日报》的数据库的数字还透露了其他一些有意思的信息：比如，老朋友中的日本人最多，达到 111 人，是排名榜眼的美国人的两倍多。更有意思的是，根据我之前利用《人民日报》数据库做的另一项研究：被中国官方宣称“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国家和组织中，位居前两位的同样是日本（47 次）和美国（23 次）。

此外，我还根据每年《人民日报》上出现“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这一段的频率制作了一张折线图，在图上有几个高峰点：1978 年，改革开放刚刚开始，与多国建交；1990 年，六四事件之后受到国际社会的孤立，需要借助老朋友开创“外交新局面”；1997 年，邓小平去世和香港回归两件大事让众多老友发来唁电和贺电。

这些数据上的发现都被我写入了一篇发表于《南方周末》的报道中。但是，数字背后更多鲜活的个体命运的故事没有充分的空间得以展现，因此后来我继续这一话题的研究，并写作了这本《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时代的变迁深刻影响了老友们个人命运的沉浮。比如，在冷战年代，第一批老友们的日子大多不好过。作为史上第一个与中共进行密切接触，且书写表示支持的外国记者，斯诺在美国成为麦卡锡主义的重点攻击对象。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斯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一段时间内竟也成了“不受中国欢迎的人”。原来，当时毛泽东主要关注的是如何消除斯大林对他的怀疑，因此在政策上一边倒地倾向苏联。然而，斯诺却发出了“不和谐”的声音。1949 年 4 月，这位美国记者在《星期六晚邮报》（Saturday Evening Post）上发表文章称：“经过对中国十余年的直接研究，我认为，苏维埃俄国难以有效地控制具有强烈民族意识的中国共产党人。”他还说，从长远看，中国共产党“不可能也不愿意使中国的民族利益从属于克里姆林宫的利益”。

当时，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人铁托正和斯大林闹翻，斯诺却不合时宜地对中国也做出了“铁

托式”的判断。这让中国对斯诺产生了很大的戒心。正因为如此，尽管斯诺从 1949 年开始就不断致函毛泽东，请求重访中国，但却一直得不到肯定的答复。

这样的例子也更让我相信斯诺是有独立人格的记者，而非某一派势力的代言人。他所遭遇的也是保持独立人格的悲剧——尽管中美双方彼此敌对，但哪一方都没有因此而欣赏他，遑论苏联。

另一位美国记者艾格尼丝·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的命运也很凄凉。她是著名的左派记者，以支持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而著称，1930 年代曾以驻中国记者身份撰写中国革命的报道。根据《党史纵览》的报道，1949 年，身在美国的她健康状况急转直下，她急切希望到“新中国”看一看。但因为被怀疑是“共产党人”、“苏联间谍”，她的护照申请屡次被拒。最后，时年 75 岁的前罗斯福政府内政部长哈罗德·伊克斯（Harold Ickes）几番奔走，终于帮助史沫特莱获得一张护照，但有效期仅一年，只能去英、法、意三国，但又不能去英国的属地，特别是香港——所有的措施都是为了防止她去中国。她在生前无法自由迁徙，最终既没能到她魂牵梦绕的中国看一看，也没有回到当时极度排斥她的祖国，而是在颇为凄凉的晚景中客死英国。

另一批令人唏嘘的老友，是被我称为“外国遗老”的人，他们的代表包括韩丁、阳早、寒春。

1945 年，美国人韩丁（William H. Hinton）受《西行漫记》的影响于 1945 年来到延安，后来他又鼓励同学阳早（Erwin Engst），以及阳早的未婚妻（也是韩丁的妹妹）寒春（Joan Hinton）来华。

寒春和阳早在延安的窑洞里结了婚，韩丁也见证了新政权的建立，并以专家身份留在了中国。在一次电视访问中，寒春讲述了 1952 年的一段往事：曾经学习核物理的她深深被在日本爆炸的原子弹伤害，当年，她在亚太和平会议上谴责大国核军备竞赛，呼吁人们不要忘记历史悲剧，科学要为和平服务。在那次亚太和平会议期间，寒春已经怀孕。同时出席会议的宋庆龄问：你给孩子起了什么名字？寒春说还没有取名。因为当时正在进行抗美援朝战争，所以旁边有人建议给孩子起名“金”，但了解寒春的宋庆龄说：为什么不给他起名叫“和平”呢？

于是，寒春生下的这个儿子得名阳和平。

韩丁、阳春、寒早，以及阳和平都是坚定的共产主义者。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一路奔向市场经济，但这一家人的思想理念仍然活在计划经济时代。在今日的中国，居住于北京并在对外经贸大学任教的阳和平或许难找到知音。为了避免自己的感情变成“资本主义的”，阳和平拒绝投资股市，也没有在跨国公司工作，因为那样会让他觉得“可能会站在帝国主义”一边，这在良心上是不被允许的。他只能在“研究毛泽东时代政治和经济”的课题中找到寄托。他曾在接受《国际先驱导报》时自嘲是四不像：“我，既不是中国人，又不是美国人，又不是知识分子，又不是工人。”

韩丁也始终怀念毛泽东时代，他甚至将文化大革命称为“毛的伟大战略计划”。1993 年，在北京举行的纪念毛泽东诞辰 100 周年的茶话会上，时年 74 岁的韩丁激动地跳到舞台上，与表演者一起演唱《南泥湾》。



有意思的是，韩丁有个从小在中国长大的女儿卡玛（Carma Hinton）。卡玛与父亲有着不同的政治观点——这从她拍摄的反思文革的纪录片《八九点钟的太阳》就可以看出来。她的另一部纪录片更为有名——讲述 1989 年六四事件的《天安门》。

由于出版审查制度，《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这本于大陆出版的书中是没办法直接提及这部纪录片的名字的。同样无法提及的，还有另一件事——斯诺的遗孀洛伊丝（Lois Wheeler Snow）一度同样被称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并受到极高规格的款待。但是在 1989 年之后，洛伊丝给“天安门母亲”运动发起人丁子霖写的信和捐助的款项都被中国官方扣留，她自己试图到中国丁子霖见面也被阻挠。对于这段故事，我只能隐晦地在书中写道：有的老朋友始终关心着中国人的公民权利。

说到底，“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这个标签还是以中共为中心的，它的判断标准说穿了还是“中国共产党的老朋友”。但是，被贴上了这样的标签就是党的人吗？甚至如段子里讽刺的那样，是“濒危”的坏人吗？答案显然要比我们想象的复杂得多。

正如周幼马所说，老朋友们的故事已经被逐渐遗忘。我做的数据统计也显示，中国官方对“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这个短语的使用也呈现出明显的下降趋势。在告别这个具备鲜明时代特征的称谓之前，我所希望做的是尽力还原个体的故事，展现称谓背后的复杂性。

方可成曾任《南方周末》报社时政记者，现在美国就读博士学位。他的著作《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一书 2014 年 4 月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

被收养华裔少女的爱与痛

MONA SIMPSON 2014 年 07 月 31 日

凯瑟琳·马（Kathryn Ma）令人难忘的第一部小说《她离开我们的那一年》（The Year She Left Us）以一位迷途少女为中心。18 岁的阿丽（Ari）在中国待了一个夏天后回到家。她在中国为一个公司工作，该公司组织收养中国女孩的美国家庭进行“寻根之旅”。他们参观孤儿院，有时是参观弃婴首次被发现的地方：公安局、商场或路边的垃圾堆。对这些孤儿来说，他们的“发现日”可能最接近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很寻常的东西——生日。

阿丽也是这样一个女孩。她被遗弃在昆明的一个商场，后来被一个叫查理（Charlie）的华裔美国律师收养。查理是个单身女人，她的姊妹和妈妈也在阿丽的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人们经常对阿丽说她是幸运的——“幸运的女孩”是这本书的头两个单词——但是她不觉得自己幸运，尽管外祖母总是提醒别人“没人必须知道”她是收养来的，她和养母“肤色一模一

样”。“你有个华裔家庭，应该轻松得多，”阿丽经常听到这句话。“应该轻松一些，但是实际上没有，”她想，“我觉得愚蠢，孤独，有缺陷。”

但是她生活在一个人口密集、社会联系密切的环境中。阿丽的全名是阿丽亚德妮·贝蒂娜·云丽·罗斯·孔（Ariadne Bettina Yun-li Rose Kong）。她在旧金山湾区长大，是“怪胎”（Whackadoodles）团体的成员之一，怪胎是“西方家庭收养的中国女孩的一个团体，每月一次在游乐场或公园里聚会，这样养父母是白人的女孩能看到跟她们相似的人。”她们去旧金山的唐人街实地考察，“在春节、元宵节、清明节和中秋节去看舞狮，吃特别的糕点，买柳条、连翘枝或木瓜枝”。查理“在帕洛斯弗迪斯长大时”，她的华裔美国家庭“从未庆祝过”这些节日。

这个团体有自己的习语，读《她离开我们的那一年》的乐趣之一就是这些怪胎们丰富的表达方式，比如“醒悟的那天”或“永远的家庭”。但是也有禁忌语。当阿丽尝试谈论她的父母如何抛弃（abandoned）了她时，“那个A打头的单词在我的嘴里感觉危险而刺激”。

在小说史上，弃儿是常见的人物，在狄更斯（Dickens）和勃朗特（Brontë）三姐妹的小说中尤为突出，但是凯瑟琳·马给我们讲述了一个惊人的21世纪的故事。1992年，中国政府立法允许外国人收养中国儿童。从那以后，美国人带回了80000多名中国儿童，其中大多是女孩，这是因为中国臭名昭著的独生子女政策以及重男轻女的文化偏见。

凯瑟琳·马笔下的“怪胎”们大多都健康成长。“一个普通话老师每周来教我们一点儿词汇，有时教我们一首歌，”阿丽说。一小部分人接受课外沉浸式教育。被犹太家庭收养的几个女孩举行了成年礼。我们见到她们时，其中很多“怪胎”即将上大学，包括阿丽，她被布林莫尔学院录取，这所大学是她外祖母深爱的母校。

但是我们的女主人公仍为自己的出身感到痛苦。她“永远的家”由三个聪明的单身女人组成，虽然不够正统，但是充满关爱：她妈妈是个公辩律师，阅读了所有关于收养的书；姨妈雷（Les）是个雄心勃勃的法官。两个人都有着男人的昵称，都没结过婚。阿丽的外祖母是个有趣的人——对两个政治正确的女儿来说也是她们的累赘：“外祖母仔细审视阿丽，大声询问她是不是散布在昆明周围贫困农村的少数民族。后来她确信阿丽不是少数民族，是汉人。当然她们永远也不可能确定这一点，但是阿丽有着典型的汉人长相。精致的脸，平滑的眉毛。脖子的比例也合适。”

和菲利普·罗斯（Philip Roth）以及更近一些的齐玛曼达·恩格济·阿迪契（Chimamanda Ngozi Adichie）一样，马不怕对自己的文化进行概括，探索它的势利和社会习俗。“我们不是唐人街的那种中国人，”阿丽的外祖母宣称，“我们说的是普通话，不是粤语。住在唐人街的那些人大多来自中国的一个地区。虽然不是他们的错……但是他们的祖先没受过教育，说的是另一种语言。”马还欢快地以揭露出我们很多人在种族上多么无知。“她长得跟你一模一样，”人们经常对查理说。马冷冷地指出：“中国人从不这么说。”

马在加州从事法律工作，她对旧金山种族政治的描述是可信的。不久之前，这座城市里的“亚裔律师加起来只能凑够五六桌”。现在唐人街里有权势的人能阻止或颠覆一位法官的晋升，当地亚裔律师协会的年度午餐会能占满整个宴会厅。马的讽刺才能在似乎随口说出的尖刻话语中得以闪现：“他的妻子丑得惊人，对这个男人来说这是好事”，或“她故意忽视一个绝好

的社交怠慢”。

外祖母讨厌女儿们的混合动力汽车，说它们“缺乏突然加速的能力，几乎毫无格调”，抱怨说这种气质可能延伸到女儿们身上。书中最生动的人物无疑是外祖母和苦恼的阿丽。她们熠熠闪光，令人难忘。对任何父母来说，阿丽都是个棘手的青少年。她曾是个“像茶杯一样轻的”婴儿，“有着漫画般的夸张笑容”，到 18 岁时，她喝酒，抽烟，到处厮混，身上有纹身，眉毛上穿了一个“金属环”。而且情况变得更糟。在中国那段时间她开始自毁。“我没酗酒闹事，也没有发狂，”她在把自己和其他女孩进行比较时说，“但我是唯一用过屠刀的人。”

阿丽的自毁不像她最初假装的那样是自发的；她承认自己在模仿一个切掉一根手指的艺术家。回到家后，她不去布林莫尔学院上课，开始和一个厌恶她的较年长的老板睡觉，从妈妈的公寓搬出去，去阿拉斯加寻找一个男人——她曾在一张照片上看到这个男人抱着婴儿时期的她。

有人可能会问，在马的世界里，男人都去哪儿了。外祖母结过两次婚，但是他们都去世了。阿丽的姨妈雷和一个已婚男人有长期婚外情——“分过两次手，但是因为突然屈服又继续了下去”。查理谈过一次恋爱，曾期望与这个男人共度一生，但是他后来渐渐疏远，然后去世了。书中有个可爱的情节突变——让人想起了爱丽丝·门罗（Alice Munro）的小说——阿丽的历险揭开了查理被抛弃的谜团。

马描述了收养中国儿童的黑暗面，她的社会批评不像狄更斯的那么充满活力和感情，更像德莱塞（Dreiser）无情的现实主义。阿丽经常听到内心折磨人的低语：我的父母是谁？他们有没有想过我？这本书的一个令人震惊的成就是作者丰富的色调：在这个被仔细审视的社交圈中，我们看着阿丽慢慢陷入危险的不安之中。阿丽比其他“怪胎”们更痛苦的原因尚不明确，但是马显然不认为收养同一种族的婴儿能增加幸福的可能。急切的寻找可能一无所获。“你找不到答案的，”阿丽的外祖母警告说，“没人会告诉她。”马是在暗示，我们中的一些人可能永远也找不到我们寻找的东西，不得不接受不合适的现实生活。

很久以前，第一次去中国时，阿丽已经意识到她的妈妈也在寻找某种东西。“我知道她在问什么：我是个好妈妈吗？你因为是我收养你而高兴吗？”

麦家笔下中国间谍小说的心理焦虑

林培瑞 2014 年 05 月 08 日

麦家原名蒋本浒，他也许是你没听说过的、最畅销的作家。他 1981 年进入中国的一所军校就读，毕业后留在军中撰稿、做编辑。1997 年转业之后，他写了很多军事情报题材的小说，

销量上千万。有些被改编成了热门电视剧和电影。如今，麦家是政府资助的浙江省作协的主席。

麦家的第一部小说（也是第一部即将以英文出版的小说）《解密》讲述的是容金珍的故事。容金珍脑袋奇大，令母亲难产而死。这个孤儿小时候沉默寡言，蓬头垢面，可能还有点自闭症，但是长大后人们发现他是个白痴天才，他的数学才能得到另一位天才的磨砺。这位天才名叫林·希伊斯，是个波兰犹太裔访问教授，他以乔治·维纳切的笔名偷偷撰写反共产主义的长篇檄文，秘密担任以色列和 X 国的军事情报分析员。X 国指的是美国，在穷凶极恶的超级代码世界里，美国是中国的主要对手。

1956 年，一个神秘的中国机构把金珍安置到特别单位 701 工作，那是一个隐秘的政府大院，专门用于研究密码。他在那里破解了紫码，不过他不知道紫码是希伊斯发明的，希伊斯当时已经去了 X 国。金珍被称为“革命英雄”，701 给他树立了一个巨大的雕像，很像罗丹的《思想者》（The Thinker）。共产党很感激他，为了给他找老婆，给他安排了一个又一个女警卫，直到其中一个与他擦出火花。

但是金珍一点也不愉快。他说的、写的、做的一切都被监视、记录。他意识到安保的目的不是保护他，而是保护他脑袋里的国家秘密。他的人际关系停滞了，他的大脑却在疯狂地更加向内心旋转。37 岁时他迷上了另一个代码，他“就剩了一具躯壳”，那个能让他“更接近疯狂和天才”的“疯子的工作”让他变疯了。

麦家的小说极少给我们展示真实的解密或间谍工作。它最吸引人的地方——真的是让人爱不释手——来自对容金珍的心理分析以及扣人心弦的情节、诡异的气氛和夸张的细节。

麦家继承了中国早期小说的很多传统，学者们将很喜欢一层层拨开这本小说中的谜团。某些章节的结束语意在挑起读者对即将发生的事情的兴趣，跟中国小说家们几百年来惯用手法一样。同样地，在可以追溯到 15 世纪甚至更早的“公案”故事讲述中，梦境可以揭示真相——所以，在《解密》中，希伊斯做了个梦，梦见自己在几千里之外，看见金珍开始从事密码研究。麦家对现代技术的魔力的痴迷与中国在 20 世纪初出版的“理想小说”相呼应，当时的中国作家们想象出了各种能让自己的国家跳跃进入现代社会的发明。《解密》对人物心理的兴趣似乎源于五四运动时代（20 世纪初至 30 年代），当时的作家们乐于探究弗洛伊德和其他西方学者的各种观念。金珍巨大的脑袋和奇异的家庭背景很像苏童和余华等当代作家的描述风格，作者偶尔采用的超小说手法则是效仿近些年的一些后现代风格。

不过，这部小说最明显借鉴的是 20 世纪 50 年代进入中国的苏联“反间谍”小说。人们最初看到的是苏联小说的中译本，但是中国作家们很快开始自己编写反间谍小说。“文革”期间，甚至连反间谍小说在政治上也不够纯洁，不能出版，所以人们只能在家手头抄写，非法流传。这种体裁的主要元素全都出现在《解密》中，包括对国防的盲目崇敬，奇怪的外国人，漂亮的小玩意，以及一层又一层隐藏的事实，其中有些事实最终也没有揭示。

鉴于麦家在中国军队的个人经历——很明显包括一些情报工作——人们自然想知道他写的东西有多少是真实的。我觉得不多。保密意识和仇外情绪在中国的军队亚文化群中肯定是很强烈的，但是《解密》中精彩的故事讲述显然更多地来自文学传统，而非生活。

举个例子：战后金珍在 701 的地址只有简单的“36 号邮箱”。持异见的中国天体物理学家方励之在自传中提到，他在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被派往一个秘密地点工作（研究原子弹），上头指示他只能告诉所有人自己的地址是“北京 546 号邮箱”。单看这一点，两者的描述反映了同一个事实。但是围绕金珍的地址出现了难以捉摸的谜团，而方励之写道，他的物理学家同行们不费吹灰之力就搞清了 546 号邮箱实际上在哪里，然后开始拿它开玩笑。“你要回 546 号邮箱啦？”他起床离开房间时，他们会这样问他。“这些话传到了我们的保密官员那里，”方励之回忆说，“他一再严肃地警告我不要把地址泄露出去。”方励之总是面无表情地答应。他的描述道出了事情的真相；相比之下，麦家的描述更像是吊人胃口的奇谈。

为了在中国出版，麦家必须在共产党允许的范围内写作。他做得很巧妙，即使他不得不时常地歪曲历史（比如，在他的小说里，1949 年后外国教授还可以自由出入中国，这在现实中肯定是不可能的）。在一些敏感问题上他采用了共产党更喜欢的说法（比如称 1949 年为“解放”）；在 1949 年之后的讲述中，他把“党”和“国”相提并论，表明不爱党是不可能爱国的。

麦家有时也想打破界限，比如他提到了解放后出现的自我审查，而且毫不掩饰地描述了“文革”时期的迫害。有些句子无疑引起了审查局的注意，比如“坦白地说……容金珍被党利用了”。不过，在我看来，他对共产党做法最明显的抵制在于他选择忽略的那些东西。他完全没有提到“为人民服务”、“五年计划”和“大跃进”等，尽管他写的那个时代充斥着共产党的这些骄傲的说法。好像他和读者们达成了一个无声的协议：不提这些吹捧，只讲故事。

接近尾声的时候，《解密》提到了一些关于人类处境的深刻的问题。甚至还提到了上帝。不过，在这一方面，这本小说比不上现代中国的一些最好的作品。《解密》虽然读起来津津有味，但是在道德深度方面，它比不上鲁迅的短篇小说、张爱玲的中篇小说，以及更近一些的刘晓波的诗歌。

本文作者林培瑞（Perry Link）是加州大学河滨分校的比较文学和外国语言教授。他的最新著作是《解析中文：韵律、暗喻与政治》（*An Anatomy of Chinese: Rhythm, Metaphor, Politics*）。

翻译：王相宜

帕蒂·史密斯评村上春树新作

PATTI SMITH 2014 年 08 月 11 日

村上春树发布新书的消息激起虔诚的期待。读者们等待他的作品，就像过去几代人在唱片店外排队，等待“披头士”（Beatles）或鲍勃·迪伦（Bob Dylan）的新专辑一样。这是一种欢快而狂热的集体期待，它是文学之声效应，也是“村上效应”。《没有色彩的多崎作和他的巡礼之年》于某个午夜在日本发行，七天就卖出了 100 多万本。我想象着那些午夜时分在东京的书店外排队买书的读者们，那些孤独的人、爱好运动的人、感到幻灭的人和活泼快乐的人。我忍不住去想，这本书对他们会有什么样的影响，而他们又在期待什么：是村上超现实、向内扩展的一面，抑或更具极简主义和现实主义的一面呢？

我隐约有种预感，觉得这本书或许是植根在人类的普遍经验之中，而不像《奇鸟行状录》里那样，贯穿着更合我胃口的诡异结构。然而我还是感觉到奇异的音符在一个无法痊愈的小小伤口之内成型、旋绕。不管村上为创作《没有色彩的多崎作和他的巡礼之年》拿出了自己的哪一面，它都存在于构筑其神秘劳动成果的石料中。

他坐在桌前，开始写这个故事：一个年轻男子长大成人时的创伤经历，以及其后必须进行的充满阴影的旅程。主人公的名字“作”带有“制作”的意思，是对作家写作过程的隐喻。多崎作 36 岁，工作是建造和翻修火车站，他总在观察如何去改进它们。他有一种动人的习惯，就是接连几个小时坐在火车站里，望着火车来来去去，倾听人流的交响。对火车站的爱维系着他人生的各个阶段，它们从玩具变成了学习和行动。在他自认为平淡苍白的生活中，火车站是一个亮点。

在某种意义上，多崎作天生就“没有色彩”。年轻时他有一群出类拔萃、关系融洽的朋友，除了他，其他人的姓氏中都带有颜色：白小姐、黑小姐、赤先生和青先生。私下里他也曾经为此深深遗憾，有时候觉得自己就像四叶苜蓿上的第五片叶子，不过五个朋友还是像五根手指一样密不可分。但在大学二年级时，他突然无可挽回地被这个团体驱逐了，没有任何解释就被摒弃，被抛入阴暗的深渊。他不再属于任何地方，他成了无关紧要的人。

多崎作深沉的痛苦似乎包涵了彩虹的每一种颜色，那是死亡的无彩之色。他觉得自己的心跳停止了，但是生命却没有停止，没有任何一种自杀方式能与他对死亡“纯粹而强烈的感觉”相称。经历过这次可怕的背叛，他活下来了，但心中满是看不见的深深伤痕。外表精确严密，内心绝望无助；受到栩栩如生的性梦侵扰，还有灵魂出窍的感觉，以及无名的负罪感和困惑。他在某些方面变成了一个陌生人，纠结而没有色彩。

虽然经历了这样的痛苦，他还是完成学业，成了一名工程师，带着同等的浪漫主义和实用思想去建造和翻修火车站。火车站经过他娴熟而微妙的改建，无不变得更美、效率更高。但他对自己的评价却很低，并不认为自己的名字和职业琴瑟和谐。幸好上天对他的看法更加清晰，命运为这段痛苦而又颇具启示的旅途送来了两个向导。

首先是灰田，这个名字也有色彩，是“灰色的田野”的意思。他和多崎作一起在某个大学的泳池游泳。游泳对两人来说都很重要，和《奇鸟行状录》里的冈田亨一样，算得上是他们的一技之长。灰田丰富了多崎作的人生，为他的生活带来了想像力与身体的活力。他带领多崎走进古典音乐的王国，为多崎播放李斯特的《旅行岁月》，深深触动了多崎的心弦。第一乐章中一段熟悉的旋律瞬间唤醒了多崎对四个有色彩的朋友们充满感情的回忆。他回想着超凡脱俗的柚木（就是白小姐）在钢琴上娴熟地弹起这首曲子时的样子。在《乡愁》（Le Mal du Pays）忧郁的旋律触动之下，他回忆着自己的痛苦，却没有立即再次产生死亡的念头。

灰田给他讲了一个濒死钢琴家的精彩故事，此人能看到笼罩在每个人周身的颜色。多崎并没有直率地回应。相反，当他沉浸在神秘的回忆氛围中，过人的欲望在他体内觉醒了。在一个“具备一切梦的特质”的“另一个现实的相位”中，他和白小姐与黑小姐发生了激烈的性接触，与此同时和“灰先生”的平行梦中状态交相映衬。猛然觉察到之后，多崎终于能够与他人产生联系，并从游泳当中体验到身体的释放。

随着灰田的消失，这段友谊也消散了——这又导致了多崎进一步的痛苦与自我评估，他痛苦地想着，自己是不是“注定永远孤独”，对于其他人来说，自己可能什么都不是，只是一个空洞的容器，可以在内部暂时休憩，之后便一言不发地飞速离开。然而灰田的出现还有一个重要的作用，他让多崎脱离自杀想法之后的日子里有了陪伴，摆脱了孤独的麻木。他刻意把三唱片一套的《旅行岁月》作为纪念留了下来，这是一段甜蜜与苦涩交织的回忆，联系着他、柚木与多崎。

第二个向导是多崎的女朋友沙罗，她的名字里也没有颜色，但她无疑有调和色彩的能力。她探究他的早年生活，多崎犹豫地讲出了自己失去四个朋友的创伤。沙罗觉得他如果不去直面潜藏在过去的问题，就永远不会完整，那些过去就像是对未来的诅咒。创伤已经形成保护的痂壳，灵魂在其下危险地涌动。沙罗对他有时更像是治疗师，而不是恋人，但他深深受她吸引。他向她表达了爱意，她也很喜欢。但她强烈的好奇刺激着他采取行动。推动他的不是剧烈的痛苦，而是渴望。在沙罗的帮助下，他有条不紊地找到了他的朋友们，最近的就住在他们的童年家乡名古屋，最远的住在芬兰乡间。去揭开这桩未解之谜需要巨大的勇气。他勇敢地去寻觅这个曾经和谐的团体中的每一个人，不顾结果地去揭开可怕的秘密。

初读《没有色彩的多崎作和他的巡礼之年》会觉得它很像村上那些极简主义的小说，如《斯普特尼克恋人》和《挪威的森林》，但它其实并不属于那个种类。它也没有《1973年的弹子球》中那种活力气息，或是他的代表作《奇鸟行状录》中的多重脉络。在《1Q84》的平行世界里，现实主义色彩处处可见。而这部小说中则有着《海边的卡夫卡》也有的那种脆弱之感，并伴随着对音乐的大量描述。很少有人能够带着这样的洞察力和温柔去描写对音乐的聆听和演奏。我们得到了一段背景音乐：李斯特《旅行岁月》中的《乡愁》。最理想的演奏者是拉扎尔·贝尔曼（Lazar Berman），最理想的聆听方式则是用黑胶唱机听。

这本书既适合新读者，也适合老读者。它有一种奇异的漫不经心之感，仿佛随着村上的书写慢慢舒展开来，有时仿佛是另一段故事的前传。书的感觉有些不均衡，有些对话显得生硬，或许是出于刻意，抑或是翻译的问题。但不时也有美妙的顿悟时刻，特别是在关于人们彼此影响的段落中。“心与心之间不是只能通过和谐结合在一起的，”多崎开始了解了。“通过伤痛反而能更深地交融。疼痛与疼痛，脆弱与脆弱，让彼此的心相连的每一份宁静之后，总隐没着悲痛的呼号；每一份宽恕背后，总有鲜血洒落；每一次接纳，也总要经历沉痛的失去。”这本书展现的是村上春树的另一面，不那么容易发现的一面。无可救药的焦躁不安，暧昧不明与勇敢斗争通往更新层次的成熟。这是村上春树的蜕变，不再是《无数金发女郎》（Blonde on Blonde），而是《音轨上的血迹》（Blood on the Tracks）。

多崎作最后的结局会是怎样？爱能否填满那空洞的容器？能否塑造出一颗折射色彩的心灵？我们可以怀有这样的希望：或许会有有一天，村上会让我们透过他有着卓越关联能力的大脑，去窥看多崎作未来的内心旅程。但它并不一定是快乐的结局，没有确定的答案。书中还

有一桩悬案未曾揭开、死亡意志徘徊不去，还有包袱需要抛掉，旧有的遮盖需要掀开。要保持希望，保持那解决一切问题的渴望，就必须怀有耐心。

作家坐在桌边，为我们写了这个故事。一个不知自己走向何方，不知自己将具备魔力的故事。结尾是一个幻相，风暴之眼中的瞬间闪光。生活中没有任何东西得到彻底解决，一切也不尽完美。重要的是继续活下去，因为只有活下去，你才能看到接下来发生的事情。

帕蒂·史密斯（Patti Smith）的回忆录《只是孩子》（Just Kids）获得 2010 年国家图书奖。

翻译：董楠

艾希曼不是平庸，而是恶

JENNIFER SCHUESSLER 2014 年 09 月 18 日

《耶路撒冷的艾希曼》的作者汉娜·阿伦特。Tyrone Dukes/The New York Times

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的《耶路撒冷的艾希曼》（Eichmann in Jerusalem）出版 50 多年来仍具有争议，许多批评者猛烈抨击她对纳粹战犯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的描述，她说他是“平庸的恶”的典型代表，是一个没有感情的、几乎没有思想的官员，“从未意识到自己做了些什么”。

这个星期，阿尔弗雷德·A·克诺夫（Alfred A. Knopf）出版社出版了《耶路撒冷之前的艾希曼：大屠杀者未被仔细审视的人生》（Eichmann Before Jerusalem: The Unexamined Life of a Mass Murderer）的英译本。该书作者贝蒂娜·斯坦尼思（Bettina Stangneth）无意加入那些批评家的行列。斯坦尼思是汉堡的一位独立哲学家，她感兴趣的是谎言的本质。2000 年左右，根据近几十年出现的资料，她开始撰写关于 1961 年在以色列接受审判的艾希曼的著作，艾希曼是第三帝国犹太事务主管。



艾希曼战后在阿根廷藏身时写了大量回忆录和其他文件。斯坦尼思在通读这些资料时发现了她写的一大段笔记，这段笔记驳斥了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的道德哲学，与阿伦特所谓的“没有思考能力”的艾希曼形象截然相反。

“我在书桌前坐了三天，思考这个问题，”斯坦尼思在家中接受电话采访时说，“我完全震惊了。我简直不能相信这个人能写出这样的东西。”

斯坦尼思在书中引用了那个文件以及其他大量资料，证明了一些学者们心目中最为关键的一点：1962年被绞刑处死的艾希曼绝不像他自己在审讯中所声称的那样，只是一名服从命令的公务员，而是一个狂热献身纳粹事业的纳粹党人。

埃默里大学的历史学家黛博拉·E·利普斯塔特（Deborah E. Lipstadt）说，如果说之前的研究者们严重削弱了阿伦特的论据，那么斯坦尼思“粉碎”了它。利普斯塔特2011年出版了一本关于艾希曼审判的书。

利普斯塔特博士说，艾希曼在阿根廷的一些真相已经陆续传开了，“但她写得生动具体”，“这家伙不是碰巧干了一份肮脏的工作，而是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全身心投入”。

斯坦尼思认为阿伦特是被艾希曼在法庭上的表演愚弄了，但她不认为阿伦特不重要，而认为她是个不可或缺的智慧伙伴。阿伦特于1975年去世。

“我没打算从历史学家的角度写一本书，只是想用史实与阿伦特辩论，”斯坦尼思说，“想了解艾希曼这样的人，你必须坐下来，从他的角度思考。那是哲学家的工作。”

《耶路撒冷之前的艾希曼》是在研究了30多个档案馆的资料后撰写的，其中当然有很多令人瞠目的事实，比如，1956年艾希曼曾起草过一份致西德总理康拉德·阿登纳（Konrad Adenauer）的公开信，提议让自己回国受审。那封信是斯坦尼思在德国国家档案馆保存的艾希曼文件里找到的。

斯坦尼思还提到，战后情报关系网的公开程度有时令人惊讶，这保护了艾希曼；西德官员不太愿意将艾希曼和其他前纳粹分子绳之以法。根据德国小报《图片报》（Bild）2011年公布的机密文件，西德官员早在1952年就知道艾希曼的藏身之处。

2011年是艾希曼审判50周年，斯坦尼思的书也于这一年在德国出版，她揭露出来的这些事很快成为报纸头条，再次引发关于战后德国政府是否与过去一刀两断的争论（德国情报机构联邦情报局[BND]仍未公布关于艾希曼的3400页的完整文件）。

但是《耶路撒冷之前的艾希曼》（英译者露丝·马丁[Ruth Martin]）的核心是详细描述艾希曼在阿根廷时的情况，以及当时围绕在他身边的前纳粹分子和纳粹支持者。它的主要依据是学者们之前就能看到，但是（据斯坦尼思说）从未被完整或系统挖掘过的资料。

“我们浪费很多时间等待惊人的新资料，”她说，“而没有坐下来仔细查看已有的资料。”

那些材料真的能够堆积成山。艾希曼在耶路撒冷的证词包括成千上万页笔录、笔记和手文

本，包括他在审判后写的 1200 页的回忆录。

斯坦尼思以他人的研究为基础，同时也把所谓的阿根廷文件拼凑到了一起，它包括 1300 多页手写回忆录、笔记以及住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荷兰记者、前纳粹分子威廉·扎森（Willem Sassen）1957 年对艾希曼的秘密采访的笔录。

扎森的笔录分散存放在德国的三个档案馆，残缺不全，页码混乱。学者们很早之前就知道这些笔录，其中一小部分作为证据被提交到艾希曼的审判中，他把那些笔录斥为不可靠的“酒吧胡言”（其中两段经过编辑的剪短节选曾刊登在《生活》[Life]杂志上）。

斯坦尼思在贴错标签的文档中发现了几百页之前不为人知的笔录。她还发现有些学者也在扎森的圈子里，而之前人们并不知道，比如海因里希·希姆莱（Heinrich Himmler）的前助手鲁道夫·冯·阿尔文斯莱本（Ludolf von Alvensleben）。斯坦尼思说，之前人们没有察觉他也参与了其中一些采访。

根据斯坦尼思的描述，这些人组成了一种堕落的读书俱乐部，几乎每周都在扎森的家中会面，阅读公众对犹太大屠杀的最新描述，讨论他们能找到的每一本书和每一篇文章，包括“敌方”作者所写的内容。他们的目标是收集资料，写一本书，揭露大屠杀是犹太人的夸张，是“600 万人的谎言”（阿根廷一本战后纳粹出版物的说法）。但是艾希曼有另一个相反的目标：确立他在历史上的地位。

在艾希曼叙述自己所谓的“杀手工作”（斯坦尼思指出这绝不是讽刺）的严酷时，他也在提供无数能证实屠杀规模的确凿事实。斯坦尼思引用了艾希曼描述自己“天生使命”的长文——“如果真有 1030 万敌人（他指的是犹太人）被杀，那我们也算完成了使命”——这让同情他的听众们感到不安。

“别的我无可奉告，因为这就是事实！”艾希曼说，“我为什么要否认它呢？”

斯坦尼思写道，对扎森的圈子来说，这篇长文标志着幻想的破灭，他们不再指望艾希曼会帮助他们为“纯粹的纳粹主义”辩护，帮助他们否认敌人的诽谤中伤。对艾希曼来说，扎森的采访只是应对耶路撒冷的极佳演练。斯坦尼思写道，以色列审讯者发现艾希曼在回答史实问题时得心应手，不过这次是为了给自己塑造一个完全不同的形象。

有些史学家说，如果阿伦特像其他很多人那样被蒙骗了，那么他的表演仍让她洞察到很多当时在现场执行屠杀的人们的心态，这很有价值。

“她说的那类人的确存在，但他不是那类人，”史学家克里斯托弗·R·布朗宁（Christopher R. Browning）说。他 1992 年的著作《普通人》（Ordinary Men）很有影响力，该书调查了波兰的一个德国警营，成千上万犹太人在这里被害。“艾希曼所假装的那种人的确存在，各种各样的人都是那样的。所以他的策略才能奏效。”

听着艾希曼在耶路撒冷的陈述，阿伦特看到了一个“不能思考的”人。听着艾希曼在赴耶路撒冷之前的讲述，斯坦尼思看到了一个非常擅长操纵的大师，擅长让理性来反对它自身，而理性原本是敌人的武器。

“作为一名哲学家，你想维护思考，认为它是一种美丽的东西，”她说，“你不愿认为一个有能力思考的人不喜欢思考。”

翻译：王相宜

希拉里新作微妙展现外交决策之艰

MICHIKO KAKUTANI 2014 年 06 月 10 日

希拉里·克林顿的新作《艰难抉择》

Sonny Figueroa/The New York Times

作为希拉里·罗德姆·克林顿（Hillary Rodham Clinton）可能参与 2016 年总统竞选的前奏，其新作《艰难抉择》（Hard Choices）的发布过程如同一次精心策划、逐步推进的军事行动：上个月末，有关班加西事件的章节被“政治人”（Politico）提前泄露（大概是为了尽早结束关于这个热点问题的相关讨论）；接下来是登上最新一期《人物》杂志（People）的封面；本周，电视上将轮番播放相关的访谈；然后是全国范围的马不停蹄的新书推介活动。

这本书本身则是一本精心构思、微妙定位的作品，把这位前国务卿和前第一夫人，以举足轻重的政策专家的形象呈现了出来。与其 2003 年的回忆录《亲历历史》（Living History）——该书总是沦为政治演说似的巧舌如簧的声明，或是大力回击各种对手对她和丈夫的辛勤工作的指责——相比，《艰难抉择》就像一位政治家撰写的大作，意在证明她在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方面的广泛经验。书中几乎没有什么新信息。与前国防部长罗伯特·M·盖茨（Robert M. Gates）极为直白的回忆录《职责》（Duty）不同，从这本书来看，克林顿保留了所有政治选项的可能性——并且希望外界知道，自己不仅熟谙外交的艺术，更拥有成为“首席决策官”的政治韬略。

如同克林顿在国务院的任期一样，《艰难抉择》并没有提出一个包罗万象的宏大外交政策愿

景——这曾是亨利·A·基辛格(Henry A. Kissinger)在其 1994 年的著作《大外交》(Diplomacy)中的做法。相反,克林顿采用了一种罗列事实的务实手法。一些评论人士认为,她在国务卿任内颇为保守,没有像达成中东和平协议那样的丰功伟绩。而这本新书(写作过程中得到了被她称为“书籍团队”的协助)展示出,克林顿的主要政治遗产在于,在全球化、科技发达的 21 世纪,重新设定了美国外交政策的方向,以及在乔治·W·布什(George W. Bush)政府的伊拉克战争和单边主义之后,帮助恢复了美国的海外形象。

这本书和《亲历历史》的少数共同点包括,两者都强调克林顿是一个善于成长和改变的人:她在书中表示,自己从过去的错误中吸取了教训,比如 2002 年对授权在伊拉克采取军事行动的提案投赞成票的做法。(她“做错了”,写到那次投票时,她说,“简单明了。”)《艰难抉择》似乎意在同时达到几个目的:回顾克林顿作为国务卿的任期;反思 2008 年失败的总统竞选;覆盖她作为第一夫人那段混乱时期的记忆(“白水事件”、莱温斯基);以及助其超脱华盛顿的党派对立、相互诋毁。

克林顿只在一个章节中呈现出自我辩护或不服气的意思。这一章讲到了 2012 年导致四名美国人在利比亚班加西死亡的那次袭击——众议院共和党人仍在对此进行调查,坚称奥巴马和克林顿隐瞒了他们了解的袭击缘由。她写道,“我不会参与拿死去的人做文章的政治斗争。”

克林顿一直都是一个勤奋的优等生,而《艰难抉择》的内容以国家(中国、俄罗斯、伊朗等)、地区(中东、亚洲、拉丁美洲)和话题(阿拉伯之春、气候变化和人权)为主题,进行了清晰的安排。尽管她没有丈夫的那种娓娓道来的天赋(他在 2011 年出版的经济方面的著作《重返工作》[Back to Work]中多有展示),她还是为普通读者——以及潜在的支持者——简明扼要且不失巧妙地分析了世界舞台上错综复杂的政治、经济和历史因素,以及美国领导人在“核心价值”和战略关切之间寻求平衡时的各种困难。她的笔触平和而有节制,时不时穿插幽默之笔,比如叙述俄罗斯领导人弗拉基米尔·V·普京(Vladimir V. Putin)邀请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参加追踪北极熊的考察活动。

在书中,一些较为积极的事件得到了详尽的描述,比如针对伊朗的外交和经济孤立,而在无人机战争和国家安全局(National Security Agency)的数据搜集项目等更具争议性的话题上,则只是一笔带过。对于密切关注政界的读者而言,不会从书中得到多少关于奥巴马政府处理阿富汗战争或反恐政策等方面的新信息。

对那些对政策不怎么感兴趣的读者,书中也点缀了一些巧克力复活节彩蛋般的个人趣事。克林顿告诉读者,为了对付时差,她有时会用一只手的指甲去戳另一只手的手掌;她没有把美国突袭奥萨马·本·拉登(Osama bin Laden)秘密住所的计划告诉丈夫(“他们让我不要告诉任何人,所以我没有告诉任何人”);在一次国际会议开始之前,奥巴马总统把她叫到一边,她以为要讨论什么敏感问题,结果奥巴马小声对她说,“你牙上有东西。”

外界普遍认为,克林顿的观点往往比奥巴马更加强硬。在相关章节中,她在担任奥巴马的忠诚助手和阐述自己观点之间小心翼翼地保持着平衡。她对普京采取强硬路线,她写道,“难对付的人带来艰难的选择”,“力量和决心”是这名俄罗斯领导人唯一懂得的语言。关于她提出的为叙利亚温和反对派提供武器和训练的建议未被采纳一事,她写道:“没人愿意在辩论中失败,我也是。但这是总统的决定,我尊重他的考虑和决定。”

谈及国务院和白宫幕僚之间被广泛报道的紧张关系时，克林顿在书中列举了她和他们的一些分歧——包括在开罗街头抗议增多之后，奥巴马向埃及总统胡斯尼·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施压要求其下台时，但她建议奥巴马保持谨慎。她还写道，看到老友理查德·霍尔布鲁克（Richard Holbrooke）被年轻的白宫幕僚边缘化和排挤时，她感到很痛心。克林顿曾经任命这位资深外交官负责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事务，而这些白宫幕僚不喜欢他张扬的、老式的风格。

关于自己的打算——是否竞选总统——克林顿写道，她尚未做出决定。这是她将面对的“又一个艰难抉择”。

翻译：王湛

千禧一代是怎样改变了中东

IRSHAD MANJI 2014 年 09 月 02 日

在如今，关于中东，你很难听到什么正面的说辞。此外，胡安·科尔（Juan Cole）可不是一般的观察家。他是密歇根大学的历史教授，也是既高产又受欢迎的时事博客写手。他是美国人，但童年时期曾经在法国和埃塞俄比亚生活过。他是个左倾的理想主义者，比那些阴沉沉的“占领者”们要乐观得多。他是个世界主义者，还经常和 20 多岁的人打交道，他的新书《新阿拉伯人》（The New Arabs）中有很多注释是数码一代根本不需要的，所以更像是对婴儿潮一代发表的讲演——你不知道什么叫“肉体空间”（meatspace，来自赛博朋克和科幻小说术语，指和“网络世界”“虚拟世界”相对的“现实世界”——译注）接着往下读。

《新阿拉伯人》按时间顺序记载了发生在埃及、突尼斯和利比亚激动人心的青年反抗运动。一开始，科尔的观点有些矛盾，“互联网的崛起在这些社会运动中所起的作用，或许并不像某些西方媒体所报道的那样重要，”他指出。

科尔认为，抗议者们要求政府更有责任感，而网络也确实极大地扩展了他们的影响力，为他们带来更多共鸣。就拿已经成为典型的穆罕默德·布瓦吉吉（Mohamed Bouazizi）的故事来说吧。这个突尼斯年轻人被政府官员敲诈和掌掴，于是在当地市政厅门前自焚，成为起义的导火线。互联网迅速放大了布瓦吉吉的神话，说他是大学毕业生，这会令一个受过教育的下层社会成员觉得他是自己人，想继承他的事业。事实上，由于贫穷，布瓦吉吉连中学都没念完。他的名字也不是穆罕默德，而是塔里克（Tarek）。啊，这就是社交媒体的洗脑力量。

不过，科尔编织了一张更大的网络，互联网只是其中一环。他的网络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要描绘出过去十年内突尼斯、埃及和利比亚爆发的各种骚乱。罢工、面包短缺、缺水、通货膨胀、失业——这一切都落在渴望个人自治与政治自由的一代人头上。这些事件令这本书充满混乱。热衷政治的读者会心满意足，而其他读者则需要耐心。

但是科尔最终还是做到了。他描述了那些站在最前列去保护埃及抗议者的人们，这是激动人心的多元主义，这个部分也格外生动。埃及信奉基督教的年轻人为他们的穆斯林伙伴充当保镖，因为他们知道穆斯林在周五要匍匐礼拜——这是他们走上街头抗议的序曲——而穆斯林们都低着头，军警会攻击他们。足球流氓们有了新的活动：在塔里尔广场附近保护抗议者。穆斯林兄弟会也去保护他们世俗的朋友，特别是在有些失去工作的导游骑着骆驼径直冲进行动分子人群的那一天。

这本书对利比亚的报道也很精彩。年轻的利比亚人目睹了突尼斯与埃及的革命狂热，也想趁机利用世界的关注。他们把网络智慧和老式的议会游说结合起来，保证利比亚上空有了禁飞区。卡扎菲的一个儿子关闭了互联网，但他被人们的智慧击败了。不同政见者们用手机拨打一个特殊的号码，可以自动把他们的语音信息传到 **Twitter** 上去。

但最后，还是发生在农田、工厂与小巷中的抗议行动导致了卡扎菲和同党的下台。穆斯林的斋月也没有导致事态停止。日落后，人们就有机会补充食物和武器。晚祷成了“起义的信号”，甚至那些密谋让伊斯兰教与政府分离的人们也遵守这个信号。

至于社交网络上那些“赞”和“分享”，科尔的书表明，革命最重要的胜利都是现实社会中的努力所带来的——也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肉体空间”。

但是胜利到什么程度呢？中东真的改头换面了吗？突尼斯的情况可以提供线索。起义之后，“成立了 100 多个新政党”。相反，之前的政权“只允许八个政党存在”。这些政党将会很忙。一个“有名的”突尼斯说唱歌手支持伊斯兰教法。一个“著名知识分子”鄙视伊斯兰教法，称其是犹太教的产物，是拙劣的模仿品。一个教师指出：“现在我们必须学习民主。”

对于一个受困于当下满足感的时代来说，这堪称异端的智慧。

## 《新阿拉伯人——千禧一代是怎样改变了中东地区》

胡安·科尔著

348 页，西蒙与舒斯特出版社，26 美元。

Irshad Manji 是《安拉，自由与爱》(Allah, Liberty and Love)一书的作者，纽约大学罗伯特 F·瓦格纳公共服务研究生院道德勇气项目的指导者。

翻译：董楠

究竟什么才是真正的自由主义

ALAN WOLFE 2014 年 08 月 19 日

在成为一种政治哲学之前，自由主义（liberalism）还不是这么难以定义，意思就是一个开明慷慨的人，有着宽宏的品位，甚至有些发胖。这样的开明人士未必受到普遍欣赏，但很少有人会觉得他们对于国家来说是危险的。在当时的语境下，自由主义的反义词并不是保守主义，而是严格。在《威尼斯商人》（The Merchant of Venice）中，巴萨尼奥（Bassanio）告诉鲍西娅（Portia），他要给她戴上“威尼斯最昂贵的戒指”，她回答：“我懂了，先生，您真是自由自在地给予。”莎士比亚（Shakespeare）的观众们听了这段台词，并不会觉得她所取笑的这位风流绅士在政治上站在左翼。

后来它成了一个政治术语——自由主义，这个词的第一次重要亮相是在拿破仑占领期间的西班牙，虽然如今它已经成了政治左派的代名词，最早却有着许多定义上的麻烦。在 19 世纪，一个自由主义者并不相信民主——事实上，那个年代大多数自由主义者都是如此；而在 20 世纪，没有任何自由主义者会承认自己竟然不相信民主。在过去，自由主义者可能是民族主义者，也有可能是国际主义者，他们有可能支持战争，也可能拥护和平。有些人接受左派思想，比如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也有些人则是极端左派的激烈批评者。到如今，那些主张市场没有干涉会运行得最好的人，通常自称“自由主义者”，作为“古典主义”（classical）的变种，但那些“现代”自由派们认为政府应当修正市场的错误。“‘自由主义者’这个词出了名的靠不住，”《经济学人》（Economist）前记者埃德蒙·福克特（Edmund Fawcett）在《自由主义：一个理念的生涯》（Liberalism: The Life of an Idea）一书开头这样写道。这本书信息丰富，追溯了历史上的自由主义倡导者和自由主义概念。

关于英国社会学家莱昂纳德·霍布豪斯（Leonard Hobhouse），福克特写道，“记者生涯对他很有帮助”。同样的话也可以用在他自己身上。福克特广泛阅读，至少通晓三种语言，是个活泼的写作者——他描述某位德国政治家“络腮胡子就像杉木篱笆，蹙起的眉头带着顽固的凶狠”——福克特旨在令当代读者更好地了解自由主义，为此，他采取了兼容并包的方式，尽可能地涉及很多东西。他坚持说，自由主义者并不是拿着学术清单跟人争论，他们理解冲突不可避免、不信任不公正的权威、相信进步，尊重一切，至少是尊重大多数人。它更像是一种从事政治活动的方式，而不是一种固定的政治立场。这个词很有包容性，从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到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从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到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都可以被囊括其中。

福克特还同样关注自由主义在 19 世纪中叶的起源，它在 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初与民主的斗争，乃至它在“二战”之后的复苏，最后简要总结了它有可能的未来。他从一个世纪跳到另一个世纪，人名与事件层出不穷，还给出无数书籍的内容概括，有些是名著，也有些冷门的书目；此外还有人物小传，以及成功或失败的政策描述。福克特尽量把所有国家都包括在内，甚至有些过头。比如，他说德国也应当在自由主义的故事中占有一席之地，然而他写到

的人物对于英语读者来说大都很陌生，比如海尔曼·舒尔茨-德里奇（Hermann Schulze-Delitzsch），他是互惠主义，也就是合作运动的倡导者；此外还有俾斯麦（Bismarck）的对手欧根·里希特（Eugen Richter），就是络腮胡子像篱笆的那一位。

自由主义者当然应该兼容并包，但在我看来，福克特在这一点上做得有点过了头。萨瓦地区的保皇党人约瑟夫·德·梅斯特（Joseph de Maistr）从各方面都是反自由主义者，说他是“保守主义者”也没错，但是紧接着又说纳粹律师卡尔·施密特（Carl Schmitt）“立场暧昧”就不对了。因为自由主义者认为冲突是不可避免的，福克特就探讨了南卡罗来纳州政治家约翰·C·卡尔霍恩（John C. Calhoun）的理念，卡尔霍恩曾经精心制定方案，保护少数人的权利。但卡尔霍恩应当与德·梅斯特和施密特归为一类，而不是像福克特书中那样，和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相提并论。“不管采取何种形式，不管出于什么利益、信念或生活方式，”福克特这样描述自由主义观点，“自由主义观念是，冲突应当被抑制和改造为竞争，在贸易、实验和争论中取得成果。”而卡尔霍恩却与此相反，他毕生都在致力于保护奴隶主的狭窄利益，并把伴随奴隶制度而来的残忍生活方式正当化。对于后来那场无可避免的著名冲突，他的激情也有贡献——但却没有取得什么好的成果。

思想史学家，特别是自由主义的史学家几乎总在摸索所谓的“亚当·斯密（Adam Smith）问题”：斯密在《国富论》（The Wealth of Nations）中对没有人情味的市场进行辩护，而在《道德情操论》（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中又主张同情心的重要性，我们该如何把二者调合起来？福克特觉得斯密是一位前自由主义者，于是高高兴兴地忽略了这个问题。不过，这只是意味着他得直面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问题。哈耶克是20世纪奥地利经济学家，主张自由放任主义，他对于福克特来说非常重要，是全书中经常出现的人物。哈耶克极力主张自发性与自由，同时在智力方面非常固执，不信任进步，不关心社会正义，这两方面又怎样调和起来呢？福克特总结说，这样的调和是不可能的。“他的整个系统都建立在权宜之计上，这种质疑从未消失——换言之，其他都不重要，不管是正义、法律、权利还是隐私——除非它们能促进经济增长。”令人遗憾的是，这段话太笨拙了。谁有这样的质疑？我知道我确实有，但福克特自己有没有呢？

福克特的任务并不是给历史上最伟大的自由主义者颁奖。但是在书中，每当福克特想要解释自由主义最典型的理念，就会提到这样一位思想家——约翰·斯图尔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穆勒也的确当得起这份荣誉。尽管他对大众的态度颇为势利，但还是有很多值得敬佩之处。《论自由》（On Liberty）文笔优美，极具教育意义，是自由主义思想的入门。穆勒受到毕生挚爱哈莉特·泰勒（Harriet Taylor）启发，与同时期的男性相比，他在写作中对女性的平等权利更具同情心。他憎恨奴隶制，在南北战争中支持北方。福克特带着敬仰引用穆勒关于边沁（Bentham）和柯勒律治（Coleridge）的文章，表明他对于那些有争议的思想家的可取观点有着准确无误的看法。福克特写道：“穆勒以降，没有人能够以自由主义观点，就互相冲突的力量发表这样多角度或不偏不倚的观点。”就这一点而言，他完全正确。

读者会发现福克特对未来的思考既不是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式的自由主义欢庆，也不是对自由主义的堕落乃至衰微的罗伯特·伯克（Robert Bork）式痛苦怀旧。他相信，我们经历了自由主义起源的完整循环，如今又要面对这样的任务——把人道与可敬的秩序带回如今乱成一团的世界。他相信，自由主义不只是西方富裕自由主义民主政治的产物，它也能伊朗、印度与中国这些为更美好的未来而奋斗的国家带来希望。“他们已经努力了好几代人，”福克特总结道，“如果这样的东西接近真实，现在就把自由主义埋葬在希望的雕



像之下还为时过早。”

Alan Wolfe 是《自由主义的未来》(The Future of Liberalism) 一书的作者。他的关于为何移民群体对犹太人有益的新书将于 10 月出版。

翻译：董楠

与亚当·斯密和卡尔·马克思较量

STEVEN ERLANGER 2014 年 05 月 01 日

托马·皮克提的畅销新书《二十一世纪资本论》认为，收入不公平正在加剧。

Ed Alcock for The New York Times

1989 年柏林墙倒塌时，托马·皮克提 (Thomas Piketty) 年满 18 岁，所以他不必再经受法国长达几十年的关于共产主义善恶的折磨人的智慧争论。他回忆说，苏联解体后，他和一位密友曾在 1990 年初去罗马尼亚旅行的经历，更让他明白了事情的真相。

“这个经历多少令我终身对站不住脚的、反资本主义的花言巧语免疫，因为当你看到那些空荡荡的商店，当你看到人们在街上排起长队却买不到任何东西，”他说，“你就清楚地知道我们需要私有财产和市场制度，不只是为了经济效率，而且是为了个人自由。”

但是皮克提对共产主义的醒悟不代表他也抵制卡尔·马克思 (Karl Marx) 的知识遗产，马克思曾努力解释资本主义的“铁律”。和马克思一样，他对不受限制的资本主义所产生的经济和社会不公非常不满。他断定，这种不公会继续恶化。“我属于从未受到共产党诱惑的一代；我太年轻了，没有赶上那个时代，”皮克提在自己位于巴黎经济学院一间通风不佳的小办公室里接受长时间采访时说，“所以，在某种程度上我更容易用全新的眼光来重新审视资本主义和不公平等重要话题，因为我没有卷入过那场争论。我无需解释自己有亲共或亲资的倾向。”

42 岁的皮克提的新书《二十一世纪资本论》（*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哈佛大学出版社）一鸣惊人，至少在经济学界是这样的。他的书抨击了人们之前对高级资本主义的仁慈的假设，预测在工业化国家财富会越来越不平等，这将对公正和公平的民主价值观产生深刻而恶劣的影响。

曾任世界银行经济学家的布兰科·米兰诺维奇（*Branko Milanovic*）称它是“经济思想史上具有分水岭意义的著作之一”。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纽约时报》专栏作家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写道，它“将是本年——也许是这十年——最重要的经济学著作”。值得注意的是，这样一本主题严肃的图书已经进入《纽约时报》畅销书榜单。

《二十一世纪资本论》的书名是为了与马克思的《资本论》（*Das Kapital*）相呼应。该书意在回归马克思和亚当·斯密（*Adam Smith*）等前辈写过的经济史和政治经济学范畴。它尽力去理解西方社会以及支撑它的经济规律。在这个过程中，皮克提抨击了“财富推动一切发展”的观点，向民主政府解决不断扩大的贫富差距发起了挑战——教皇弗朗西斯（*Pope Francis*）和奥巴马总统最近也都对不公平所带来的后果发出警告。

皮克提在一个政治家庭中长大，他的左翼父母曾参加 1968 年打倒传统法国的示威游行。后来他们前往法国南端的奥德（*Aude*）省养山羊。父母不是他想谈论的话题。他说，更相关、更重要的是他这一代人“现成的经验”：共产主义的崩溃、东欧的经济衰退，以及 1991 年的第一次海湾战争。

那些事件让他明白：在这个世界上，经济观念能产生如此糟糕的结果。海湾战争向他展示出，“如果政府愿意，它们能在财富再分配方面做很多事情”。皮克提说，快速军事干预迫使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放弃科威特和它的石油，这体现了共同政治意愿的非凡力量。“如果我们能在几个月内派 100 万大军到科威特索回石油，那我们应该也能就避税港做一些事情。”

他是想派军队到英吉利海峡人口稀少的避税天堂格恩西岛吗？声音柔和的皮克提几乎大笑起来。“我们甚至不必那么做——一些简单的基本贸易政策和贸易制裁就能立刻解决问题，”他说。

皮克提是个优等生，通过传统方式成为法国精英人士，18 岁时被精英云集的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录取。22 岁时完成关于财富再分配理论的博士论文，该论文获得了一些奖项。然后他到麻省理工教经济学，两年后由于对美国的经济学研究感到失望而返回法国。

“我的博士论文主要是关于纯粹的经济理论的，因为那是最容易做的事。我在马萨诸塞理工学院做助理教授时也是研究经济理论，”他说，“那时我很年轻，在那方面做得也很成功，所以那是个轻松的工作。但是我很快意识到那里没有人认真收集关于收入和财富的历史数据，所以我开始做这件事。”

他说，理论经济学过于关注保证计量经济学和统计插值技术正确，“你没有真的在思考，你不敢问那些重大的问题”。美国经济学家们也往往把自己研究的问题缩小到自己能回答的范围内，“但有时这些问题不是很有趣，”他说，“我想写一本真正的、能与每个人对话的书，

这意味着我不能选择自己的问题。我必须正面应对那些重要的问题，不能逃避”。

他厌恶经济学领域的狭隘。所以他决定写一本巨著，一本在他看来既是关于经济学也是关于历史的书，一本能够手把手引领普通读者的书。

他也不畏惧文学，从简·奥斯汀（Jane Austen）和巴尔扎克（Balzac）等现实主义小说家对社会的描述中寻找灵感。在这些小说中，财富最好是通过聪明的婚姻获得的；每个人都知道继承土地和财产是过上好生活的唯一方式，因为光靠劳动是挣不到钱的。他想知道那种臆断后来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通过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经济学教授伊曼纽尔·塞斯（Emmanuel Saez）合作，皮克提把自己的研究从法国延伸到了美国，他发现 20 世纪初的规律——“资源分配的头 10% 几乎是租赁收入、股利收入和利息收入”——似乎在 20 世纪 70 年代至 90 年代初变得不那么普遍了。

“我过了很长时间才意识到实际上我们在慢慢朝之前均衡的方向发展，我们是一个漫长的渐变的过程的一部分，”他说。他在 20 世纪 90 年代末开始研究这个问题时，“它不可能被如此清晰地理解——又多出 20 年的数据对我们理解战后这段时期帮助极大。”

他的发现——在现代化的电脑帮助下——是以先进工业国家几个世纪的财富积累和经济增长数据为基础的。这些观点说起来也相当简单：资本收入的增长率比经济增长率高好几倍，这意味着工资收入的比例相对在缩小，工资收入的增长极少能快于总体经济的增长。在人口和经济增长放慢时，这种不平等变得极为突出。

战后经济看起来不一样了，那种不平等降低了，原因是历史灾难。“一战”、经济大萧条和“二战”摧毁了私人资本的大量积累，特别是在欧洲。法国人所说的“辉煌的三十年”——战后大约 30 年的快速经济增长和不断减少的不公平——是个反弹。当然，美国的变化不是那么明显，因为战争是在别的地方进行的。

人口和经济增长率高于正常水平，加上对富人增税，减少了不平等。但是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专业和政治假设——不平等将会稳定下来并自行减少——被证明是错误的。我们现在回到了传统模式，每年的资本收益率是 4% 至 5%，而经济增长率大约是 1.5%。

所以不平等很快开始加速，某种程度上里根（Reagan）和撒切尔（Thatcher）对富人减税的政策加剧了这种状况。“涓滴经济学本来可以是正确的，”皮克提简单地说，“只不过它碰巧错了。”

他的作品既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挑战，也是对放任经济学的挑战，这两种理论“都指望依靠纯粹的经济力量来实现普遍的和谐或公正”，他说。马克思认为由于体制的矛盾，资本收益率将降低至接近零，带来崩溃和革命，皮克提的看法则完全相反。“资本收益率可能永远高于增长率——这实际上是人类历史上大部分时候的情况，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未来还会是这样。”

2012 年，1% 收入最高的美国家庭获得了全国收入的 22.5%，是自 1928 年之后的最高值。现

在 10%最富有的美国人占有全国财富的 70%不止，比 1913 年镀金时代结束时的比例更高。而且其中一半是由最富有的 1%的人占有的。

皮克提有三个女儿，分别 11 岁、13 岁和 16 岁。他不是革命者。他是个无党派人士，他说自己从未为任何政客担任经济顾问。他称自己是个实用主义者，只是凭数据说话。

他承认自己的著作从本质上是政治性的，他对现在常见的管理层高薪非常不满，说“花 1000 万请一个人为你工作的想法，纯属观念形态的问题”。

他说不公平本身是可以接受的，它能激发个人主动性和财富创造，在累进税和其他措施的协助下，它能让社会上的每个人都更富有。“我不介意不公平，只要它是对大众有益的，”他说。

但是和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家约瑟夫·E·施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一样，他认为极端的不公平“在威胁我们的民主体制”。民主不只是一人一票，而是承诺提供平等机会。

他说，当收入、政治影响力和知识信息产出极端不平等时，“民主体制很难运行。20 世纪的一个很大的教训是我们不需要 19 世纪的不平等继续下去。”但在他看来，这正是资本主义世界再次前进的方向。

跟他合作的塞斯说，“托马既追求完美，又没有耐心——他想让事情做得又好又快。”他补充说，皮克提“对经济学有着难以置信的直觉”。

这本书的最后一部分表达了皮克提的政策理念。他支持对真正的财富（去掉债务）执行全面累进税，产生的收益不是交给效率低下的政府，而是重新分配给那些拥有较少资本的人。“我们只是想要一个公平而实际的分担税务负担的方法，”他说。

他说，与单独的收入相比，净财产更能表明支付能力。“我只是建议减少世界上二分之一或四分之三几乎没有财产的人的财产税，”他说。

该书是一年前以法文出版的，它不是没有遭到批评，特别是针对皮克提的政策处方，有人认为从政治角度讲它太天真。还有人指出，有些资本的增长是因为老龄化人口和战后抚恤金计划，不一定是继承来的。

肯定还会有更多的批评，皮克提说他对此持欢迎的态度。“我当然期待争论。”

翻译：王相宜

《俄罗斯人》带我们认识普京时代

MICHIKO KAKUTANI 2014 年 03 月 13 日

2月7日，索契冬奥会那场铺张华丽，时有媚俗的开幕式向我们展示了一场简洁的、世界博览会式的俄罗斯历史，歌颂它在科学与艺术方面的辉煌成就，又把斯大林时代的恐怖一笔勾销。此外开幕式还精心设计，试图让整个世界忘记弗拉迪米尔·V·普京（Vladimir V. Putin）总统统治俄罗斯期间的黑暗一面——扼制异见人士、制订压迫性的反同性恋法律——塑造出一个屹立于世界舞台的现代化超级大国形象。

在记者格里高利·费弗引人入胜的新作《俄罗斯人：权力背后的人们》（*Russians: The People Behind the Power*）中，这个超大庆典与俄罗斯长久以来对宏大、醒目和强调的爱好是分不开的，冬奥会上那些麻烦不断、引起争议的问题（大笔超支、未建成的酒店房间，以及不适宜举办滑雪和滑冰运动的春季温度）令当今俄罗斯普遍存在的腐败，以及克里姆林宫实行的权力政治显得更加突出。

索契是黑海边上一处旅游胜地，普京喜欢在那里度夏，选择那里作为冬奥会举办地其实是违背逻辑的，让人想起非理性在俄罗斯历史上（乃至反映历史荒谬性的俄罗斯文学中）通常扮演的角色。费弗指出，“这座城市是亚热带气候，因此需要使用保温毯，储存前一年高加索山脉的积雪，”此外，“更不理性的是，第一流的国际体育赛事举办地距离北高加索地区只有半天车程，在那里，伊斯兰军事分子几乎每天都要发起袭击。”对自杀炸弹与恐怖主义袭击的恐惧导致了体育史上所谓最全面的安保措施。

《俄罗斯人》是费弗为我们带来的一本富于启发、有见解的俄罗斯入门书。他的母亲在共产主义统治下的俄国长大成人，他自己在为国家广播电台担任驻莫斯科记者。这是一本拼贴式的书籍，里面有关于历史背景的旁白、家族回忆、对公众人物和普通人的采访、政治评估，以及为这个横跨九个时区的国家所拍摄的鲜明快照——从莫斯科那些花里胡哨、专为招摇的新富们开设的饭馆、俱乐部到边远西伯利亚的荒原，那里的人们依然每一天过着寒冷贫困的生活。

《俄罗斯人》并不像大卫·雷姆尼克（David Remnick）的《列宁的坟墓》（*Lenin's Tomb*）和《复活》（*Resurrection*）等报道并阐释苏联帝国解体与全新俄罗斯诞生的书籍那样深刻，这本书中追溯的东西与本·犹大（Ben Judah）的新作《脆弱的帝国：俄罗斯与弗拉迪米尔·普京的情史》（*Fragile Empire: How Russia Fell In and Out of Love With Vladimir Putin*）也有大量重合之处。它还大量引用了爱德华·基南（Edward Keenan）与理查德·派普斯（Richard Pipes）等学者的思想。但费弗擅长为普通读者提供一种精神指引，去认识这个复杂的国家与它痛苦的过去。

书中关于斯大林恐怖与古拉格，乃至苏联生活遗下的社会与心理负担及遗产的章节非常严肃冷静；而关于俄罗斯历史上的苦难塑造了俄罗斯人怀疑主义和宿命主义的人生观的章节则比较富于推测性。费弗的书中还谈到了时事话题，诸如普京对个性的狂热崇尚，关于西方与俄罗斯关系的旷日持久的讨论；俄罗斯人嗜酒背后的意义（马克·劳伦斯·施拉德[Mark Lawrence Schrad]以此为主题写了一本新书《伏特加政治》[*Vodka Politics*]）；乃至这个国家对

独裁统治的历史遗留感情——部分是由于地域广大，部分是由于这个国家的落后，乃至人民对混乱无序状态的恐惧。

费弗引用基南的话，说人民中的“绝大多数”都和苏联领导人一样，“相信只有集权和寡头政府能够保护他们共同渴望的秩序”；对“民主选举宪政”几乎一无所知，他们并不欣赏“在其他地方受到赞赏的那些尊重法律的细节”。

费弗说，基南对苏联的这些观察“很大程度上也适用于当今的俄罗斯”，“又是一个巨变的十年过去，传统政治文化——既 20 世纪 90 年代的后苏联文化——似乎即将被推翻，然而普京实际上重新带回了旧有的方式。”

在费弗看来，普京故意把 20 世纪 90 年代描述为“混乱和犯罪的时期”是为了利用人民对分裂和无政府主义状态的“传统焦虑”，迎合他们对苏联超级大国地位的怀旧心态。费弗指出，普京对车臣叛乱分子发起的战争帮助他得到权力，而且利用恐怖主义威胁“作为主要正当理由，对国内民主体制发起攻击”。

借助原油价格上涨的契机，普京一上任就采取了若干决定性措施，恢复了克里姆林宫的实权。“他迅速把经选举上任的官员撤换为总统任命的官员，”费弗写道，“掌握了对国家媒体的控制权，把竞争对手排除出政府，不断修改选举法和其他法律，以便保持自己对国家和国家官员们的控制。”普京的其他措施还包括反对同性恋的战役，并帮助自己商业上的同盟们富起来，这些都旨在巩固自己的政治基础，巩固自己的权力。费弗认为，“普京的改革并没有清扫俄罗斯多种多样的黑帮，而是让克里姆林宫成了最大的黑帮头子，从而为社会灌输一种秩序。”

索契冬奥会是一项苏联级别的超级大工程，花费了 500 多亿美元，是初始预算的四倍，它成了普京“裙带资本主义”的象征——用巨额金钱让他的商业合伙人们富起来，这些钱很大一部分来自纳税人的钱。“仅仅普京的童年好友、从前的柔道陪练，阿卡迪·罗登伯格（Arkady Rotenberg）这一个人的公司就赚了 70 亿美元以上，”费弗认为，“比 2010 年温哥华冬奥会的全部预算还多。”

普京故意摆出强者姿态——开赛车、摆出柔道姿势、光膀子骑马——这些都是经过精心设计的，正如他粗俗的谈吐。尽管在西方人看来这可能很滑稽，费弗认为，这些是为了迎合国内那些传统的观众们。他曾经这样谈起车臣军事分子们：“不好意思，如果我们在厕所里找到他们，就把他们在茅坑里就地处决。”后来他还曾经粗暴地驳斥报纸上关于他的报道，说它们都是小道消息，“就像鼻涕抹在报纸上”。

费弗觉得俄罗斯在不远的将来会怎样呢？他写道：“正如信息开放的时代里许多并不建立在真正民意支持基础上的政权一样，普京政权天生并不稳定，”但是，尽管普京已经决定不参与 2018 年连任选举，费弗还是对俄罗斯快速向真正民主的转变持悲观态度，在苏联解体之际，这种转变一度很有希望。

费弗认为，要想重新整修俄罗斯的各种体制（如法律制度）是非常困难的，普京的“裙带制度”已经对国家各种体制带来了严重伤害，许多所谓中产阶级（本书认为，其中一半是政府官员）对俄国的现状已经进行了大量投资，因此并不欢迎真正的改革。

“民意调查表明，”费弗写道，“与西方形式的政府相比，许多对现状不满的人还是更希望有一个强者执掌克里姆林宫——只要换个更好的人就行了。”

翻译：董楠

新书讲述日本民族的坚忍与顽强

JAMES FALLOWS 2014 年 06 月 05 日

三年前的 3 月份，日本发生了史上最严重的 9 级地震，它导致的海啸使 15000 多人丧生，使数以万计的人无家可归，将很多村庄整个从地图上抹去。它还导致福岛核电站出现故障，使该地区受到核污染，日本政府因此缩减核电计划。

地震发生时，我住在北京，我看到中国媒体的报道从通常对日本的不友善转变为对日本人忍受苦难的坚忍精神的尊敬。有一张照片出现在中国的电视和报纸头版上。它是一张对日本人的航拍，领取救灾物资的人排成了一条蜿蜒而永远有序的长队，其中包括小孩和老人。惊讶的中国人的反应是：想象一下一个社会里的所有人都愿意耐心地等几个小时，而不是你争我抢地挤到最前面。

大卫·皮林（David Pilling）从 2002 年至 2008 年担任《金融时报》东京分社的总编。他也是在北京就任新职位期间得知地震发生。他很快返回日本报道那次灾难和它的后果。他构思了这本书，说目的在于“描述这个在历史上不断战胜灾难的顽强不屈的民族”。

了解日本的人都知道，坚韧不拔是被日本人高度赞扬的个人和集体品质。像 *ganbaru*（意为“忍耐”），*ganbatte*（“坚持下去”）和 *gaman*（“勇敢的决心”）这样的词经常出现在日本人的对话中。在日本对自己历史的描述中，挫折和它带来的勇敢的振作扮演着主要的叙述角色（很像美国对自己过去的理解主要是不断地向西挺进）。这也是皮林构建自己故事的方法，开头和结尾都是关于满目疮痍的东北地区的毁坏和恢复。中间部分是对日本应对灾难的漫长记录以及对日本近些年政治经济情况的详细讨论。最近几十年经常被称为日本经济在 20 世纪 80 年代繁荣之后“垮掉的几十年”，但是皮林指出，这种说法是一种误导。

对灾难中心地点的报道将引起所有读者的注意。皮林生动地重现了一波波不同的破坏。首先是地震，“持续了漫长的六分钟”。然后是海啸，它不是葛饰北斋绘画中著名的达到顶点的单一“大浪”，而是有些地区的海平面上升了 130 英尺。皮林描述了一个多层体育馆，镇里的人躲在里面等海啸结束。水充满了大楼，60 多个人被困在里面淹死了。皮林及时赶到东北

地区，目睹了下一个阶段，幸存者穿过被夷为平地的家园，寻找亲人和物品的踪迹，整个居民区都消失了。这些场景立刻让我想起了约翰·赫西（John Hersey）的《广岛》（Hiroshima），虽然两者的原因明显不同，但是它们最长久的破坏都源自辐射。

在这本书的结尾，皮林回到了东北地区，当然是发现人们在坚韧不拔地对抗苦难。其中包括一位摄影师朋友，他勇敢地多次探访事故核电站附近的“禁区”，记录那里发生的情况。

在开头和结尾之间的分析章节里，作者认真研究了日本对一系列外来势力的态度，先是警惕地尝试接受，而后是既恐惧又愤恨地躲避。首先是中国；然后是殖民时代控制了亚洲其他地区的西方工业化国家；然后是过去 60 多年来日本的征服者和同盟国美国；最近是它的亚洲邻邦们。其中的大部分主题和插图都似曾相识，从日本对自己独特性的迷恋——“英国的雨和日本的雨很不一样，”东京的一位教授对皮林说——到“二战”后“拥抱战败”战略的后果。《拥抱战败》是约翰·W·道尔（John W. Dower）1999 年关于该主题的著名图书的名字。

在我看来，皮林根据自己在日本当记者的经历对 21 世纪日本的描述更有启发性。他在日本的大部分时间里是小泉纯一郎执政。这位首相派头十足，执政时间较长，头发蓬松柔软，皮林称他为“留着额发的武士”。这些章节，以及对现任首相安倍晋三的“安倍经济学”的分析，对于我们衡量来自日本的新闻有几点价值。

首先，可能最让美国读者惊讶的是在几十年的“失败”和经济停滞之后，现代日本是个富裕而适于生活的经济、科技大国。中国最近在总量上超过了日本，但是中国的人口是日本的十倍。日本是世界第三大经济体，是英国和法国经济量的总和。皮林提醒我们，日本的汽车“现在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好的”。在几乎所有的先进行业，从生物技术到电子工业到航天科技，关键部件都来自日本公司。“他们都在谈论日本的衰落，”一位日本朋友告诉皮林，“但是这里的街上没有坑，这里的汽车质量很好，这里没有暴力，空气干净。挺好。”

皮林还有用地讲述了日本既想与亚洲其他国家融合——特别是中国——又想保持独特性的矛盾心理的发展过程。在日本军队被驱逐出中国约 70 年后，这两个国家之间的敌意更深了。这种紧张关系的一个长期根源是中国政府的反日宣传，可能是为了转移民众对政府的不满吧。本书中预见了当前的刺激因素：安倍政府一系列独断的民族主义行动。日本、中国和美国的经济都比各自的政治体系更强劲、更现代。就像卡雷尔·范·沃夫伦（Karel van Wolferen）在《日本权力构造之谜》（The Enigma of Japanese Power, 1989）中做出的著名论断那样，日本在这方面的问题是缺乏政治问责中心，或者说缺乏一个能对日本前进方向做出决定并承担最终责任的人。皮林解释了情况后来发生了什么变化，以及为什么尽管如此，这个结论总的来说仍然正确。

皮林在描述自己的观察时，特别是最近遭受灾难的人们和地区的情况时，他雄辩而直接。而在总结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时，他似乎本能地过于避免作正面回答，好像他最担心的批评是夸大其辞。“如果说快速老龄化不是重大挑战，那是愚蠢的。”“如果认为一个单一事件，甚至包括 2011 年 3 月的海啸这样的重大灾难，能在一夜之间改变这个社会，那就太草率了。”“不过我们应该警惕，不要只看表面。”

我同意所有这些观点。生活是复杂而矛盾的，在日本更是如此。但是皮林在这本有价值的书中讲述的故事比这些委婉暗示要更清晰。就像他说的，“虽然有‘垮掉的二十年’和多方面



的问题，但是认为日本已死的报道是言过其实。”

本文作者 James Fallows 是《大西洋月刊》的国内记者。他写了四本关于亚洲的书，最新的一本是《China Airborne》。

翻译：王相宜

韩国如何用流行文化征服了世界？

MARY H.K.CHOI 2014 年 09 月 09 日

1985 年，12 岁的洪又妮随全家从韩国首尔搬到芝加哥郊区。她原来住在首尔江南区的狎鸥亭，这可不是普通的地方，而是最富有、最高级的住宅区。简单说吧，洪家在《江南 Style》（Gangnam Style）走红 27 年前就是“江南 Style”了。对于韩国历史来说，30 年是很长的一段时间，当然对于网络明星现象来说也是如此。

洪又妮的新书《韩酷的诞生：一个国家是怎样通过流行文化征服了世界》（The Birth of Korean Cool: How One Nation Is Conquering the World Through Pop Culture）宽泛地追溯了韩国自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以来的发展，当时韩国的人均 GDP 水平比加纳还低。如今，韩国是世界第 15 大经济体。从鸟叔（Psy）的《江南 Style》视频到三星为苹果手机提供的芯片，这本书探讨了种种因素如何汇集在一起，令韩国的流行文化成为完美风暴。

韩国的活力来自于“韩流”——这股酷浪潮流行甚广，连奥巴马总统都在讲演里提过。洪又妮说，韩国的崛起要归功于哈佛政治学家约瑟夫·奈（Joseph Nye）所谓的“软实力”；这个国家输出影响力不是通过军事力量，而是通过“兜售惹人喜爱的形象”。韩国政府拨款 10 亿美元发展流行文化，洪又妮，乃至我自己这样七八十年代在海外长大的韩国人已经有了“首尔在变得时尚起来”这种诱人的想法。要知道，19 世纪的西方探险家们曾经给韩国起了个外号“隐士之国”，觉得它不愿意和别的国家打交道。

《韩酷》按时间顺序记载了作者努力适应西方的过程。她回忆起不能冲水的厕所、体罚和儒学教义，这一切在韩国父母们头脑中根深蒂固，深深影响了他们，带来令人痛苦的羞辱。正如同西方孩子害怕恶魔，海外长大的韩国孩子们则长年生活在“被送回韩国”的阴影之下，如果被抓到吸烟或者考试得了 C，就会听到这样的威胁。这本书中关于学习压力的一章正好吻合了可怕的高自杀率，“自杀是 40 岁以下的韩国人最常见的死因。”

描述这一切的时候，洪又妮的视角略有偏差，介乎一个努力适应新课程的 12 岁女孩与迷失

了国家身份的人之间。这种笨拙的自我意识与韩国式的“察言观色”混合在一起——在任何情况下都得细心观察最小的细节，避免在社交中出丑。一旦出错，就会暴露出你不过是这个国家的过客，会让你遭到许多轻蔑，还有随之而来的羞辱。

书中有很多个人趣事和第一手叙事，还有很多来自在韩国的外国人或是爱管闲事的外国人对韩国的热情评论。关于“han”这个字眼的一章尤其精彩。“han”这个词特指韩国人对于被侵略了 400 年的历史，乃至 1910 年至 1945 年的日本统治的怨恨。这一章始于伊恩·弗莱明（Ian Fleming）在经典詹姆斯·邦德（James Bond）小说《金手指》（Goldfinger）里的一句话：“地球上最冷酷无情的，就是高丽人。”我们有人觉得这种憎恨是我们的“泡菜脾气”，并不介意讨论它起源于一种特殊的恐惧。洪又妮发现，“很多韩国人说，韩国人是‘han’的产物”，但也有人说‘han’可能会杀死你——有一种医学上承认的病名叫“火病（hwa-byong）”，也就是“郁闷得不得了生的病”。

洪又妮这本书的前 1/3 好像是一本《怎样当好韩国人》的指导手册。对于我来说，这是全书最精彩的部分。后面对韩国文化的解析虽然既深刻又幽默，但却显得愈来愈无关。洪又妮的叙事一开始像是一本回忆录，慢慢变成了格拉德威尔式的社会科学——一本内容充实的机场读物，适合做巡回演讲，但却像是商业杂志上的特写，读起来很吃力。这么说吧，《韩酷的诞生》是关于创意勇气的精彩案例研究，作者试图为之赋予更宽泛的意义，她的仓促努力并没有完全打动我。

Mary H.K.Choi 是新闻项目“TakePart Live”的首席写手。她的 Kindle 书《啊，别在意》（Oh, Never Mind）将在今年秋天出版。

翻译：董楠

资深新闻记者推荐关于本行的好书

JOHN WILLIAMS 2014 年 07 月 17 日

本周，时报（The Times）媒体方程式（Media Equation）的专栏作家、文化记者大卫·卡尔（David Carr）给安德鲁·佩蒂格里（Andrew Pettegree）的《新闻的发明》（The Invention of News）写了一篇书评。我请卡尔和他的几个同事推荐自己最喜欢的关于新闻工作的图书。

记者拉维·索梅亚（Ravi Somaiya）推荐的是《出发地》（Point of Departure），它是 20 世纪中期英国记者詹姆斯·卡梅隆（James Cameron）的文选。索梅亚说：“他的新闻报道——比基尼环礁核试验，在加蓬采访阿尔伯特·施韦泽（Albert Schweitzer）等——生动感人，充

满力量，你有时感觉自己的心跳速度都跟着加快了。他向我表明，你可以在诚实、准确、公正的同时，告诉人们你的所见所感。”

媒体记者乔纳森·马勒（Jonathan Mahler）为“不得不排除那么多值得推荐的书”而感到痛苦，“但是如果只能选一本的话，我一定是选伊夫林·沃（Evelyn Waugh）的《独家新闻》（Scoop），它可能是最有趣的小说。它讽刺的是 1938 年左右的“舰队街”（指英国报纸业——译注），涉及一个名叫《野兽》（The Beast）的虚构的报纸，在一个虚构的非洲国家发生的一场虚构的内战，以及一个被阴差阳错派往那里报道内战的倒霉的驻外记者。”

媒体编辑彼得·拉特曼（Peter Lattman）选择的也是小说：汤姆·拉赫曼（Tom Rachman）的《不完美主义者》（The Imperfectionists），它讲述的是“罗马的一个垂死的英文报纸。这本 2010 年出版的处女小说比我读过的任何非虚构图书都更好地刻画了一个新闻编辑部 and 其中的人物。”

这个问题让卡尔想起了一个痛心的时刻。“9·11 袭击发生几个小时后，”他说，“我在教堂街和议事厅街的拐角处。7 号楼着火后倒塌了。一大块碎片和烟尘冲到街上，我躲到一辆车下。车下有一只鸽子，我凝视着它的眼睛，这一刻我们有了跨越种族的交流。‘我们没事吧？世界要灭亡了吗？我们，呃，是一条战线上的吗？’那一时刻和那一阵烟灰过后，我定了定神，在车下发现一本斯特伦克（Strunk）和怀特（White）编写的《文体要素》（The Elements of Style），它是我们这个职业的基础文本。书上有墨水标明是港务局的藏书，我知道它是被从世贸中心的港务局办公室炸飞出来的。我从没遵守过这本书的规则——我是个浮夸的、离经叛道的作家——但是它志向远大，条理清晰，这一点我很喜欢。我把它放在玻璃板下面，书上还留有当天的灰尘，和它放在一起的是我当时在困惑和混乱中为《纽约》（New York）杂志写的唯一一篇还可以的文章的副本。我珍惜它在我家中的存在，尽管我没有听从它的建议。”

具有引用价值的话

“过去，如果和明显有性格缺陷的人合作能让我挣到更多钱或者能让我参加更好的派对，那我愿意。但是现在我年纪大了，我对此完全不能容忍。”——节选自文学网站 The Millions 对书稿代理人埃林·霍西尔（Erin Hosier）的采访

翻译：王相宜

棱镜门回忆录《无处可藏》惹争议

MICHAEL KINSLEY 2014 年 06 月 15 日

“我的立场很简单，” 格伦·格林沃尔德（Glenn Greenwald）写道，“总统下令进行非法窃听是犯罪行为，应该追究法律责任。” 犯法就要付出代价，就这么简单。

但是格林沃尔德应该知道，哪里会那么简单。法律禁止政府窃听美国公民，法律也禁止泄露政府公务文件。你不能只选择你喜欢的法律，不理睬你不喜欢的法律。也许你可以选择，但是你不能就此声称一切都非常简单。

格林沃尔德是爱德华·斯诺登（Edward Snowden）和一些报道斯诺登收集的机密文件的报纸之间的中间人。这些文件揭露了美国国家安全局的大范围窃听及其他丑闻。他的故事充满了新闻工作者的匹夫之勇，主要的背景位于充满异域风情的香港。这是个精彩的故事，如果格林沃尔德本人不是这么讨厌的话，这个故事也许会更有意思。也许他在现实生活中迷人、慷慨，但是在《无处可藏》（No Place to Hide）中，格林沃尔德像个自以为是、满腹牢骚的人，认定所有的事情都很“简单”，如果你不同意他的看法，你就是他所谓的“当局”的一部分，他认为“当局”为了自己邪恶的、从不解释的目的控制着一切。

改革者都是不好对付的人。不过，他们的风格各不相同。有些是苦行主义者，比如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的小说《波士顿人》（The Bostonians）中的伯宰小姐（Miss Birdseye），“在 50 年的人道主义热情之后，她对人类的了解比她到实地印证大多数安排都不公平那天要更少”。

有些是自恋狂，比如维基解密（WikiLeaks）的创始人朱利安·阿桑奇（Julian Assange）。他们以圣人自居，感觉作为圣人，他们有权不理睬约束普通人的规则。格林沃尔德愤慨地指出，阿桑奇在“瑞典被两个女人指控性侵犯之前很久”就已经遭到了这样的批评（20 年前，英国作家迈克尔·弗莱恩 [Michael Frayn] 写过一个小小说和剧本，名叫《现在你知道了》 [Now You Know]，主人公是一个与阿桑奇类似的人物）。

有些是政治浪漫主义者，比如爱德华·斯诺登。将近 31 岁的他有着早熟青少年的甜美、纯洁的阴谋论世界观。他似乎渴望殉道，据格林沃尔德说，他对于有可能“在高度戒备的监狱里度过几十年或一生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平静”。

那格林沃尔德呢？他认为自己不是改革者，而是无情的革命者——类似于罗伯斯庇尔（Robespierre）或托洛茨基（Trotsky）。他认为旧制度彻头彻尾地腐败，他就是那个推翻它的人。格林沃尔德提到“给公民的隐性交易：不要挑战，你就没什么好担心的。管好自己的事，支持或者至少容忍我们做的事，你就没事。换句话说，如果你想被认为没有做坏事，就必须忍住不要激怒行使监视权力的当局。这个交易的结果是民众的不抵抗、顺从和随大流。”这听起来像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曾经非常流行的理论——“压抑性容忍”（repressive tolerance）。

在整个《无处可藏》中，只要在辩论中站在格林沃尔德这一侧的人或出版物的话，他就会加以引用。如果《华盛顿邮报》（The Washington Post）或《纽约时报》（他说《纽约时报》“在出版内容上直接接受美国政府的指令”）的一篇文章或社论在某个问题上支持他的观点，他一定会引用来证明自己是正确的。如果《纽约时报》的公共编辑（意见调查员或读者代表）玛格丽特·沙利文（Margaret Sullivan）在某项争议上同意他的观点，那他简直会心花怒放。他详细引用了一项民意调查的结果，那项调查表明更多人转而同意他的观点——政府在 9·11 事件后对恐怖主义的应对措施比它想要应对的威胁更危险。

格林沃尔德似乎没有意识到他收集的每一项表明人们同意他观点的证据，实际上削弱了他认为“当局”不能容忍任何异议的观点。没人阻止人们批评政府，也没人以任何方式阻止他们支持格林沃尔德。没人阻止这个国家的龙头报纸设立一个定期专栏，表达对公司或政府权威的不同意见。如果现在大多数公民同意格林沃尔德的观点，认为在这个国家异见正在被压制，而且对上门或打电话自称民意调查者的陌生人坦率说出自己的观点，那谁还能说异见在被压制呢？格伦·格林沃尔德以对抗顺从、政府压迫为荣，他可以自由地在任何媒体上宣传这本书，它在机场书店卖了上万本，而书店周围满是国土安全部的人——就这样还说我们正在构建的是独裁社会，那得多牵强附会？

在豪言壮语中，格林沃尔德并没有严肃地从法律的角度为向记者泄露政府机密进行辩护。他只是宣称“记者享有其他人没有的正式的和不成文的法律保护。比如，人们通常认为记者公布政府机密是合法的，但是对于以其他身份进行这一行为的人来说情况就不同了”。

终于，我觉得有件事我和格林沃尔德是可以达成一致的：宪法面向所有人。不应该存在一个被称为“记者”的特殊群体，拥有公布政府机密文件的特权。

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格林沃尔德对于记者特权的唯一问题是，有些人并不认为他是记者。他认为自己和鲍勃·伍德沃德（Bob Woodward，美国著名记者——译注）一样拥有特权，他这么想没错。但是其他人也拥有这个特权。特别是在博客时代，你不可能把职业记者与其他任何想发表自己想法的人区分开。这是好事。

斯诺登泄露的机密很重要——这是一个合法的独家报道——如果不是因为它们，我们可能永远也不知道国家安全局的违法行为。大多数从大型官僚机构泄露的机密都是“有益的”：对国家安全没有危害，对无辜的人没有危害，提供的是公众应该知道的信息。

问题是，格林沃尔德说斯诺登让他“用自己的新闻判断力只发表那些公众应该看到的、不会伤及无辜的文件”。这又是格林沃尔德和斯诺登所相信的东西的反证。斯诺登可能愿意相信格林沃尔德能做出正确的判断——但是你愿意吗？即使你的确信任格林沃尔德的判断——事实证明这可能是不明智的——我们怎么能确信下一个泄密者也会如此谨慎呢？

问题是谁来决定。至少在我看来，比较清楚的是，拥有报纸的私人公司和他们的员工不应该拥有发布政府机密的决定权，也不具有公布机密而不负法律责任的免责权。在民主社会里（对不起，格林沃尔德，我们还是民主社会），这个决定应该最终由政府做出。毋庸置疑，政府通常会对自己的机密过于保护，所以决策过程——不管结果如何——应该公开地向发表倾斜，并尽量减少拖延。但是最终你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总得有人做决定，而这个做决定的人

不能是格伦·格林沃尔德。

格林沃尔德所持权威媒体对异见人士存在压迫的看法让他登上了《与媒体见面》（Meet the Press）节目。在节目中，主持人大卫·格雷戈里（David Gregory）问道：“鉴于你协助斯诺登犯罪的程度……格林沃尔德先生，你为什么不应该被指控犯罪呢？”这个问题令格林沃尔德目瞪口呆，“花了一分钟时间才反应过来他实际上问了”一个显然很粗暴的问题。

它的粗暴之处在哪里呢？呃，首先，格林沃尔德说，“鉴于……的程度”这种说法可以被用来为任何无根据的影射辩护，比如“鉴于格雷戈里谋杀邻居的程度……”。但是格林沃尔德没有否认他“帮助和协助过斯诺登”。所以这个问题并不是没有根据。而且，它是个问题，不是论断——是很多人想问的一个十分合理的问题，格雷戈里给了格林沃尔德一个机会来回答：如果泄密者可能要入狱，那秘密的接收者为什么就该免责呢？但是格林沃尔德似乎觉得自己不需要辩护。他说，提出这个问题就是“荒唐地认为”“记者能够或者说应该为进行新闻工作而被起诉”。

格林沃尔德曲解证据时的自以为是有时很可笑。他在书中提到参加一个犹太女孩的成人仪式，拉比告诉那个女孩，“你永远都不孤独”，因为上帝一直在上面看着你。“那位拉比的意思很明确，”格林沃尔德解释说，“如果你永远无法逃过最高权威注视的目光，你就别无选择，只能听从权威的指令。”我觉得那位拉比不是这个意思。

新闻媒体竭力揭露政府的秘密，政府竭力保护自己的秘密，没有看不见的手来确保平衡。所以对泄露政府信息我们该怎么办？把犯罪者关起来，还是给他们颁发普利策奖（普利策奖的评委选择了后者）？这不是个简单的问题。但是我不觉得我们能制定一项政策，授权报纸和记者追逐和发布他们能找到的任何国家安全机密。这不是复活节，没有彩蛋。

Michael Kinsley 是《名利场》杂志的专栏作者。

翻译：王相宜

托马斯·品钦笔下的互联网牢笼

但汉松 2014 年 08 月 05 日

当爱德华·J·斯诺登（Edward J. Snowden）接连不断地披露着美国在世界上进行大范围数字监控的行为时，美国小说家托马斯·品钦（Thomas Ruggles Pynchon）也许在美国的某个角落，心情复杂地看着那个年轻叛国者引发的轩然大波。正如伟大的作家都是隐秘的历史先知

一样，品钦的这部最新小说《放血尖端》（*Bleeding Edge*, 2013，尚未引进中文版），构成了对“斯诺登事件”的某种文学预言——虽然他笔下的极客怪咖们生活在 2001 年的纽约城，彼时的《爱国者法案》和“棱镜计划”还未登场，但这些人已经深察到权力政治正在渗透互联网，无处不在的监视与阴谋，让网络空间应验成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笔下的《一九八四》。

如果我们认真对待了品钦的《葡萄园》（*Vineland*, 1990）和《性本恶》（*Inherent Vice*, 2009）这两部常被轻视的中后期作品，就不难发现以“互联网”的科技政治视角来讲述新世纪的人类经验，这对于暮年品钦而言是一次必然的行军。在《葡萄园》中的里根时代，互联网还只是属于少数科学热爱者的实验品，另一张网罗住世人的流行媒介是那个叫“电视”的匣子，沉迷其中的“类死人”活得“像死一样，只是方式不同……只要醒着，无时无刻不盯着电视”。此时的品钦还以他特有的精灵古怪，将未来的数字化网络生存冥想为“无重量、无形体的电子在场与缺席的链条”，认为那一长串“零”和“一”所表征的人类个体是一种更高级的存在，就像“天使，小神或 UFO 里的来客”。而在以 1960 年代终结为背景的《性本恶》中，主人公多克在“阿帕网”里已经见识了那超越地理界限的人际联结有多么迷幻——“那完全是另一个奇异的世界，时间、空间，所有这些都变得不同。”

可以说，当品钦在更早期作品《万有引力之虹》（*Gravity's Rainbow* 1973）中写下那句“万物皆有联结”的名言时，“互联网”或许早已进入到他的文学哲思中，浸淫为和“火箭”一样的文学-科技母题的核心象征物。不过，品钦对网络时代的想象是末日论式的，他从未像电脑科学家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Nicholas Negroponte）那样天真浪漫。早年的尼葛洛庞帝曾预言，互联网的普及将会让信息分享无比平等而自由，会使控制去中心化，同时还将使人群变得更加和谐。而品钦的小说却悲观地预感到，这种神奇技术不会被政府所见容，他借《性本恶》中主人公多克之口说：“当年他们发现迷幻药能变成一个通道，让我们看见某些被他们禁止的东西，于是政府立刻宣布这是禁药，还记得吗？信息跟这个不就是一码事么？”

虽然今日的互联网早已无法禁绝，但虚拟空间中统治与颠覆、权力与反抗的战争从未停歇。诚如法国哲学家吉尔·德勒兹（Gilles Deleuze）在《控制社会附记》（*Postscript on the Societies of Control*）中所言，以封闭空间为特色的“规训社会”（*disciplinary societies*）已过时，取而代之的是“控制社会”（*societies of control*），是网络节点和交换机中更为隐蔽和无孔不入的监视与治理。是的，面对残酷的现实吧——当生活于高压政治和互联网防火墙内的我们还在壮怀激烈地谈论“抄水表”和“翻墙”时，斯诺登则狡黠地告诉世人，NSA 现有的技术可以实现远程控制任何一部（包括处于关机状态的）手机，甚至可以全程监控你在屏幕上的输入过程并由此分析你的大脑思维！

品钦在《放血尖端》中对于互联网传奇的叙述，是从 2001 年的纽约春天这个历史的奇异点开始的。一方面，数月后曼哈顿的世贸中心即将在全球围观下遭受一次可怕的“去势”袭击；另一方面，纽约的“硅巷”刚刚从“互联网泡沫”带来的纳斯达克大崩盘中艰难复苏。在这段充满末日情绪的诡异日子里，两个程序员从硅谷和全球资本主义的迷梦中醒来，开始在键盘上建立一座互联网之下的圣殿。这个基于“深网”（没错，就是 *Deep Web*，《纸牌屋》第二季里提到的那个可以获得美国副总统通话记录的神奇玩意）的虚拟城市叫 *Deep Archer*，它为那些无根无权的网络社会贱民（如黑客、泄密者、反全球化的革命家和恋足癖人士）提供一个逃离之所。在这里，一切的节点访问都是匿名，一切的网页链接都是随机生成，只为躲开搜索引擎的“爬虫”程序和政府机关的跟踪审查。

品钦用他特有的诗性笔调，描述了主人公玛克欣（Maxine）点着鼠标，第一次进入这个酷似纽约城的虚拟都市的情形。她起初在电脑屏幕上看见的，是“一个弓箭手站在深渊边缘，拉着满弓，朝下瞄准那无边无垠的混沌之所，等待着”。进入城市后，她发现这里不仅有火车站、街道、酒吧和教堂，而且 3D 设计美轮美奂，所有场景的逼真度都高得惊人。里面虚拟人物连发丝的飘动和眼皮的跳动都纤毫毕现，而且每张面容都从真人而来。用设计者的话来说，这就是印度教中的“降凡”（或者叫“阿凡达”，Avatar）——“当你从屏幕的一端进入到虚拟现实中，这不就像是人死去，然后又得以投胎转世吗？”品钦写道。当 9·11 事件发生之后，这里更是变成了纽约那些死难亡灵的游魂收容站，他们以虚拟的身体继续游荡在这里。

然而，对深谙互联网原罪的品钦而言，这般美好的“乌托邦”并不能真正的实现逃离，它最深刻的意义或许反而在于其堕落和幻灭。《放血尖端》中曝光的一系列关于 9·11 事件的跨国阴谋，不过是他戏仿美国作家汤姆·克兰西（Tom Clancy）式政治惊悚小说的虚晃一枪，读者最后看到的是以 IT 巨头艾斯（Ice）为代理人的国家机器如何通过收买黑客和后门程序，渗透瓦解这个“深网”中的圣殿，让它“变得和阴影之下的上方世界如出一辙，从一个链接到另一个链接，将所有东西置于他们控制之下，使之变得安全、体面。”

在品钦看来，这种堕落和幻灭几乎是注定的，因为从本质上说，当我们试图对抗晚期资本主义对网络工具性的滥用时，并未能（也无法）去打破这种科技的工具性，而只是从另一个方向拥抱了这种工具性。互联网作为权力机器和抗争武器的双重意义，让那些以代码和键盘为反击手段的新“勒德派分子”进退维谷，欲逃无计。

对网络时代蕴含的这种悲剧性，批评家凯瑟琳·海耶斯（N. Catherine Hayes）有过无比精湛的总结，在著作《我的母亲是计算机》（My Mother Was a Computer）中写道：“信息之梦最初具有一种逃离的形象，但当它愈发强力地体现为一个可靠的寄居之所，它就愈发看上去不像是逃离，而是一个竞技场，在这里统治与操纵能够以新的方式进行角力。”

在移动互联网和网络社交媒体大行其道的今天，我们已很难想象远离智能手机和无线网络接入的日常生活，我们每时每刻近乎强迫症式的点击和分享正表明，那无形的可怕控制正深入人类的肌体、骨髓和神经元——“老大哥”在不知何处的秘密机房里监控和管制着我们从网络中发出的危险思想，跨国公司在大数据的帮助下自动收集着我们的网络踪迹、预测着我们的消费行为。今天，人类究竟该如何面对这种数字化生存背后的牢笼？品钦的《放血尖端》不仅清醒地刻画了转折时代下互联网的险境，更进一步促使我们去反思信息技术的政治与人的未来。

但汉松是南京大学英文系副教授，研究领域为现当代美国小说，翻译过托马斯·品钦和桑顿·怀尔德的作品。



## 办公室隔间的秘密历史

RICHARD SENNETT 2014 年 08 月 04 日

你如何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的工作场所——这是尼基尔·萨瓦尔（Nikil Saval）在《隔间：办公室秘史》（*Cubed: A Secret History of the Workplace*）中探讨的一个重大主题。实际上，办公室的历史毫无“秘密”可言；从美国内战起，随着白领队伍的壮大，经理们和设计师们经常讨论员工们应该坐在哪里，应该用什么样的办公桌，他们周围的墙壁和窗户应该是怎样的。萨瓦尔是《n+1》的编辑，他写的不是秘史，而是更有趣的东西。他把直白的事实描述与各种文学、文化和政治洞察融合在一起，让他讲述的故事更黑暗，不枯燥。

19 世纪末之前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白领阶层。大多数办公室都很小，最多雇佣几十名员工来为经理和合伙人服务；甚至连大工厂都可能是精简运营。办公室本身通常是亲密的、非正式的场所，员工和合伙人坐得很近，甚至可能是挨着坐。每个人都处理所有事务；通过口头交流而非文件备忘录就能把工作完成。萨瓦尔根据赫尔曼·梅尔维尔（Herman Melville）的故事《录事巴托比》（*Bartleby the Scrivener*）进行的绝妙分析，发现这绝不是幸福的天堂，而往往是亲密的暴政。另外，当办公桌连在一起时，把衣衫寒酸的穷人与富足的成功人士分开的界线就更加明显。不过，“人们认为，虽然低级职员和合伙人之间的差距是巨大的，但也是可以轻易克服的。”

萨瓦尔的故事本质上是关于这个办公室王国变得更大、组织更严密时会发生什么。实际上，当办公室变成由内部分工主导的官僚机构时，美国梦就褪色了，虽然在仪式上它仍被拿出来炫耀。国家铁路和煤炭钢铁业引领了这方面的变革，它们需要成百上千名专业服务工作者，而不是一小群全能职员。

通过一种巧妙的方式，萨瓦尔陈述了电话和打字机的出现如何助长了这一变革，把办公室文化从口头文化变成了书写文化：电话迫使人们记录下遥远的、没有人情味的交流；打字机的出现使得这么做成为了可能。在很多不停膨胀的美国城市里，向外扩张变得越来越困难、昂贵，于是建筑物向上发展。一开始，设计师们对于 19 世纪末耸立起来的钢筋结构的高层建筑该如何组织内部空间，毫无头绪。萨瓦尔说同样也属于新生事物的立式档案柜变成了“隐喻意义上的办公室”，大楼的每一层像一个单独的文件夹堆积起来。这是一个巧妙的想象，甚至可以变成现实。

工效设计师弗雷德里克·泰勒（Frederick Taylor）是这种组织结构的罪魁祸首。他想对办公室工作进行改造，让它变得和工厂里的体力劳动一样高效。这就体现为组织严密的工作场所：在开放空间里为低级职员设计一排排整齐划一的桌子；为中级职员设计几乎相同的隔间；为高层的少数几个人设计有个性的办公室。但是“二战”结束时人们已清楚地发现，组织严密的办公室可证明是弄巧成拙：那时候，工业分析师埃尔顿·梅奥（Elton Mayo）和其他人已经证明，整齐的文件柜式办公室实际上适得其反，令人压抑，使人消极，因此降低了工作效率。

萨瓦尔生动地描述了极少数有远见的建筑师们的设计，他们努力想让工作场所人性化。例如，弗兰克·劳埃德·赖特（Frank Lloyd Wright）1906年设计的拉金行政办公楼（Larkin Administration Building），它位于水牛城，带一个采光很好的中庭，这是最早进行这种尝试的作品之一；1958年完工、密斯·范·德·罗厄（Mies van der Rohe）设计的纽约西格拉姆大厦（Seagram Building），几乎是高度现代主义能够想到的最美的办公环境。但是如果设计师不是个天才的艺术家/建筑师，客户不是格外开明，那我们在程式化的工作场所之外还有哪些常见的选择呢？人性化办公室的本土形式是什么呢？

现在这个问题也许比半个世纪前更复杂，因为白领公司的工作在过去两代中已经发生了转变。公司晋升体系——一个人可以在这个体系里升职、降职，或者至少保持原位——不复存在；代替它的是一个更灵活的组织结构，它意味着更多的工作是短期的、暂时性的。例如，根据我的计算，1965年的白领工作者平均一生换四至五次工作，而如今，他们一生中很可能会为十几家公司工作。即使他们在一家公司呆了很长时间，也很可能会随着企业的左右摇摆而做不规则移动。人们常说，公司里的固定身份已不复存在。即便如此，这意味着员工们的自我身份认同至少是被打乱了。

那个可能改善这种情况而不是让其变得更糟的设计，让萨瓦尔有点困惑，他的反应是正常的。建筑的改造力是个有争议的问题。人们尝试过“办公室景观”，也就是把大群人混合在一起；还尝试过“热桌”和“电子脐带”，它们让人们不必通过固定的办公室或办公场所也能联系起来。像硅谷的谷歌园区这样的办公园区的规划者，创造了一种类似现代公司小镇的东西，它把工作和休闲结合起来，提供健身房、高档餐厅、医生和日托所。这种解决方案的一个问题是，这些功能性的便利设施使得人们呆在办公室的时间更长了。从批评的角度看，它们组成了一个让人屈服的建筑群。

萨瓦尔认为，白领工作者应该以某种方式反抗，但是在寻找解决方案时，他不再是在书写历史，而是变成了一个社会学家。他一开始就告诉我们，他写这本书是受到了激进的社会学家C·赖特·米尔斯（C. Wright Mills）1951年的伟大著作《白领》（White Collar）的启发。在《隔间》的结尾，启发萨瓦尔的具体原因已然明了：米尔斯担心白领工作者是被压迫的阶层；因为他们抗拒工会，相信美国梦，所以他们是被动防卫。他们可能幻想着毁掉办公室，但是没有为自己的愤怒采取任何有效的行动。在萨瓦尔看来，工作者必须停止像众所周知的循规蹈矩的人或者不愉快的“组织中人”那样思考。

办公室的建筑样式与组织中产阶级有关吗？萨瓦尔采访了一些激进的办公室建筑师，比如弗朗西斯·达菲（Francis Duffy）。萨瓦尔还离开美国去考察荷兰在组织工作流程方面的一些实验。设计顾问埃里克·费尔德亨（Erik Veldhoen）给他提供了一些直率的建议：“你知道卡尔·马克思（Karl Marx）吗？他现在得活过来。”萨瓦尔够成熟，没有接受这个建议，但是即便如此，他也从中发现了一些吸引人的东西。或许，如果工作者在考虑如何控制工作场所，那他们将开始考虑如何改变工作本身——但是萨瓦尔采访的专家都没能提供令他信服的建议。

对这本书来说，这个结局不能令人满意，却最为诚实。《隔间》读起来令人愉快：文字优美，结构清晰。因为现在很多美国人——包括男人和女人——清醒的时间大半是在办公室度过的，所以它也是一项重要探索。

## 《隔间：办公室秘史》

尼基尔·萨瓦尔著

有插图。352 页。双日出版社（Doubleday）。26.95 美元。

Richard Sennett 在纽约大学教社会学。他曾是美国工作委员会的主席。

翻译：王相宜

向“工作狂”职场文化开炮

ANN CRITTENDEN 2014 年 04 月 08 日

1912 年马萨诸塞州劳伦斯的纺织业罢工，是美国劳工史上令人难忘的一刻，据说当时以女性为主的纺织工人上街游行时标语上写着：“我们想要面包，但是我们也想要玫瑰。”这个真假莫辨的标语在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被朱迪·科林斯（Judy Collins）和约翰·丹佛（John Denver）写入歌中，意思变成了“我们需要一个体面的生计，但是我们也需要生活。”

但是此一时彼一时，现在有时间闻玫瑰香味的梦想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难实现。对职业人士来说，每周工作 50 小时以上是常事。如今四分之三有小孩的女人在外面工作。现在父母双方加起来每年工作的时间比 1970 年大约多 28 天。和 1912 年一样，感觉最缺乏空闲时间的大多是母亲。

近些年，有数不清的书在讨论过度劳累的美国母亲。这些书的数量之多以及其中表达出的不满程度暗示了一个巨大的社会问题。布里吉德·舒尔特（Brigid Schulte）的《不堪重负》（Overwhelmed）是最新的疾呼。舒尔特是《华盛顿邮报》的撰稿人，有两个学龄孩子。她问道，自己“散乱、四分五裂、筋疲力竭的”生活只是个特例，还是某个更大的问题的产物，是其他成百上千万严重缺乏时间的女性共有的问题？

她回答这个问题的“旅程”所涉及的大多数地方，和去圣地亚哥孔波斯特拉的朝圣之路一样，并非“人迹罕至”，但是如果有人仍然认为那只是她自己的问题，那舒尔特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提醒读者事实不是这样的。舒尔特报告说，美国工作场所普遍的“理想员工”标准是一个没有家庭责任、没有足以与工作争夺精力的兴趣爱好、最好完全没有私生活的人。不符合这个完美标准的人有可能得到餐巾纸那样的待遇：用完后被丢到一边。她讲述了就业市场对有家庭责任的人存在着广泛的、公然的歧视，以及对需要照顾别人的人的下意识偏见。比如，

有项研究表明，寻找初级或中级职位的母亲得到的工作机会比跟她其他条件相同但是没有孩子的女人少一半。

与此同时，在家里，完美母亲的奥秘像萨佛纳罗拉（Savonarola）一样在心里折磨中产阶级母亲。祖母们对女儿们过度养育的努力感到惊讶，她们忙得不可开交：足球比赛，音乐和芭蕾舞课，节目表演，睡前读名著。难怪有工商管理硕士学位的母亲们有大约 30% 不再出去工作；很多受过教育却不必要挣钱养家的美国母亲都不再工作了，比例超过其他工业国家。

我们为什么走到了这一步？为什么经过几十年的痛苦之后，还是几乎没有采取行动来减轻这种极端的压力？《不堪重负》给出了几个答案。可能会让有些读者感到意外的是，在美国，没有任何法律限制一个员工每周必须工作的时间，没有任何法律阻止雇主让领薪水的专业人员无限制地工作而不必付加班费。讽刺的是，随着成百上千万女性进入专业和管理队伍，受过教育的员工的平均周工作时间也加长了很多。

在家里，男人们没有分担太多责任。在做家务活和照看孩子方面，那些上班挣钱的母亲们仍比父亲们多做了一倍。2010 年的一项调查表明，有伴侣的女性科学家承担了 54% 的做饭、打扫和洗衣服的活儿，而有伴侣的男性科学家们只承担了 28%。

舒尔特生动地讲述了自己丈夫的一件轶事。他也是个记者，感恩节上午他胳膊下面夹着一箱六罐装啤酒去朋友那儿，留下她在厨房里准备节日大餐。他不知道孩子去哪里看牙，也不知道如何常备卫生纸这样的日用品或者如何按时付账单。

我们身边都有这么一个人。这就是为什么有这么多人写这方面的书。

我们反对的不只是剥削员工的公司和仍感觉在家有特权的男人，而是美国文化：这种文化仍对母亲的角色持自相矛盾的态度；仍认为女人应该照顾别人；把“工作”提升到神圣的地位。而女人们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接受了这种文化。

这种传统文化有强大的支持者。这本书写得最好的一部分是舒尔特对帕特·布坎南（Pat Buchanan）的采访。布坎南对于毁掉美国建立高质量的统一儿童保育体系的可能性，要负主要责任。

1971 年，国会通过了一个受到两党支持的法案，它本可以建立这样一个体系，由社区组织运营。布坎南本人的母亲是罗马天主教徒，在家养育九个孩子。他虚构了一个前景，说在这个体系中长大的孩子会像工厂生产出来的机器人，是被一个没有灵魂的国家养大的。反对共产主义的右翼也很快采取了反对行动。当时他是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总统的特别助理。“我们不仅想扼杀那个法案，”布坎南告诉舒尔特，“我们还想一下击中它的核心。”迫于这种压力，尼克松否决了这个法案，国会接受了他的否决。

“那个忽悠人的法案完蛋了，”40 多年后，布坎南得意洋洋地说，“永远完蛋了。”

让母亲们的生活更具可行性的统一儿童养育体系和其他政策在其他国家很常见，包括丹麦。舒尔特在为寻找更好的办法进行调查时访问了丹麦。北欧海盗的后裔证明，人类的文化是可以改变的。但是舒尔特在美国发现的微弱的“亮点”，不足以鼓舞我们期待美国在短期内会

改变。舒尔特热情地讲述了其中一个进步的标志：百思买（Best Buy）集团的“只关注结果的工作环境”，它允许员工们自由安排时间，只要能完成工作就行。但是在三页之后，我们得知这个制度被新任首席执行官休伯特·乔利（Hubert Joly）叫停了，他认为它“从根本上是有缺陷的”。

舒尔特在努力寻求一些能鼓舞我们的东西，但是她最终得出了一个谬论：如果我们个人更努力地调整自己，那这个体制性的问题就能得到解决。

在差不多花了 300 页记录母亲们过于忙碌、筋疲力竭的生活——还记录了这对家庭生活、生产力和头脑的伤害——之后，舒尔特在华盛顿的一个冥思中心结束了自己“理解时间的旅行”。她在那里学会了“如何控制自己受污染的头脑无休止的喧闹”。她建议我们把时间分割成更短、更集中的小块；不要频繁地查看邮件；挤一小会儿时间玩耍；考虑参加“自我效能训练营”。

她说的大多是很好的建议。但是像所有的自助类建议一样，它们无法对抗那些根深蒂固的力量，那些力量无视——甚至可以说敌视——大多数美国人的情绪健康。舒尔特是在用指甲刀对抗海豹突击六队。帕特·布坎南肯定能理解那种无力感。

本文作者 Ann Crittenden 是《母亲的代价》（The Price of Motherhood）一书的作者，也是一位母亲。

翻译：王相宜

罗琳侦探小说揭出版业内幕

HARLAN COBEN 2014 年 07 月 14 日

罗伯特·加尔布雷思（Robert Galbraith，又名 J·K·罗琳[J.K. Rowling]）的侦探小说《蚕》（The Silkworm）非常有趣，书中写到了一次鸡尾酒会，席间出版商丹尼尔·查德（Daniel Chard）做了致辞，说：“出版业目前正在经历巨变与崭新的挑战，但是有一件事百年至今从未改变：内容为王。”

这样的话若是来自籍籍无名、在书榜上名列中游、名叫罗伯特·加尔布雷思的神秘作家，可能根本不会有人注意。但同样的话如果是由哈利·波特（Harry Potter）系列的作者，也是史上最成功的作家之一 J·K·罗琳写下来的，影响力可就大多了。

问题就在这里，它也是这本书给人带来的巨大乐趣之一。

你希望以《蚕》本身的价值来评判这本书，不去管作者怎么样。事实上，这是评论家的责任。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写这种“盲评”，虽然目的是高尚的，但却显得不真诚，至少也是不大可靠。如果一个作家的生平总会在他的作品中投下阴影，在这本书里，这位作家投下的不只是日全食，简直就是一个特大号黑洞。

更何况罗琳（还是别用假名称呼她了）还挑战了出版界，这让事情变得更糟（或更好）。本书主角是英国私家侦探克莫伦·斯特莱克（Cormoran Strike），去年在罗琳的《布谷鸟的呼唤》（The Cuckoo's Calling）中首度登场；小说家欧文·奎恩的妻子利奥诺拉·奎恩（Leonora Quine）长相俗气，她雇用斯特莱克寻找失踪的老公。欧文·奎恩刚写完一本令人不快的小小说，几乎所有熟人的黑暗丑陋秘密都被他端出来了。奎恩太太告诉斯特莱克，欧文可能呆在一个作家的疗养地，寻找他可能会变成常事。

但是，当然啦，一切都不是表面上看起来的那样。欧文·奎恩最后被残酷地杀害了，犯罪场景正来自他的新小说。斯特莱克和他的漂亮助手罗宾·埃拉科特（Robin Ellacott，他俩的关系就像福尔摩斯和华生、尼克和诺拉、蝙蝠侠和，那个，也是罗宾）进入了图书出版的世界，这个世界令人惊讶地名声狼藉。他们调查了奎恩最后的手稿中那些几乎没做任何掩饰就提到的人，他们都能让人洞察到作家世界的内部。

嫌疑人中包括奎恩的编辑杰里·沃德格雷夫（Jerry Waldegrave，“作家们都很不一样……我从来没见过不古怪的作家能写出好东西”）；他的经纪人伊丽莎白·塔塞尔（Elizabeth Tassel，“你知不知道……到底有多少人觉得自己能写作？你没法想像人们拿给我什么样的垃圾”）；他的出版商丹尼尔·查德（“我们需要读者……更多的读者。更少的作家”）；还有高傲的文学小说家迈克尔·范克特（Michael Fancourt，“和大多数作家一样，我也喜欢通过写作某个主题来找出自己对它的真实感受。这是我们阐释世界的方式，是我们为之赋予意义的方式”）。

《蚕》由罗琳创作，是那种“写你熟悉的事情”，然后再把它增加到十级马力的小说。它究竟是一部犯罪小说，还是一部名流曝光，抑或生动的讽刺文学，或者以上皆是呢？这里面的好处/坏处在于，你把它当做一部侦探小说来阅读，但你总会注意到书中充满对出版界的观察，这种观察正来自出版界的顶层。这使得纯粹的消遣——对于一本侦探小说来说所必须提供的——成为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这里问题又来了，谁会在乎呢？如果你想要更彻底的放松，那还是换一本书吧。不过读罗琳谈写作还是很有意思的。

小说的名字叫做《蚕》（小说中那本毒舌手稿的名字也是这个），就连这个名字也和写作有关系，因为蚕的一生“是对作家的隐喻，他们经历痛苦去获得好东西”。她谈起嫉妒时说，“如果你希望一生都只能获得暂时的同盟者，这些伙伴们还会对你的每次失败欢呼雀跃，那就去写小说吧。”她谈起互联网上的喧嚣：“有了互联网，随便什么会写几个字的白痴都能当角谷美智子（美国著名评论家——译注）了。”还有一个无法写好逼真女性角色的男作家：“他笔下的女人都很情绪化……像经前综合征。”关于一个名叫多克斯·潘格利（Dorcus Pengelly，书中有些名字是直接来自霍格沃兹学校来的）的女作家：“她写的是伪装成历史浪漫小说的色情文学”，而我们的受害者“会因为她的销量而杀人”。

书中甚至还讨论了自费出版的价值，奎恩的情妇抱怨说自己走上了“独立”的道路，因为“传

统出版社不知道什么才是好书，就算好书砸到他们脑袋上也认不出来”。

这些观点罗琳都认同？没人知道，也没人关心。尽管有这些装点门面的东西，罗琳最终的目的还是娱乐，她也提供了娱乐。如果我们总忘不了她是个名人，那么也应该时常提醒自己，她是讲故事的大师。抛开 J·K·罗琳（这是个中性化的笔名，用来代替她的原名“琼尼·罗琳”，好让男孩子也来读哈利·波特）的名气，独立判断罗伯特·加尔布雷思（一个完全是男性化的笔名，并没有做中性化处理）这本书的价值，会发现《蚕》同样是一本充满悬疑、文笔精彩、彻头彻尾的英国侦探小说。

斯特莱克在阿富汗战场上因为地雷而失去了一条腿，被描述为“跛脚的荣誉战士”，一个非常有存在感的男人，“因为他的到来，房间显得小多了。”哈利·波特的粉丝们会希望在克莫伦·斯特莱克和哈利·波特小说里受人喜爱的巨人鲁伯·海格（Rubeus Hagrid）找到共同点，但这样的比较感觉很牵强。如果在阅读《蚕》的时候，J·K·罗琳从未离开你的脑海，那么，值得称道的是，罗琳或加尔布雷思从未让哈利·波特的世界进入这本书。我们完全置身于这个坚实、阴郁、浮华，由麻瓜组成的现实世界里，或许只除了她描写斯特莱克办公室里一件吱嘎作响的家具是“老放屁的皮沙发”。在那一刻，读者可能会感觉斯莱特林学院大厅里的沙发回来了。

虽然发生在现在，《蚕》几乎可以被视为传统的英国犯罪小说，再加一堆古怪的嫌犯，一个女孩版“礼拜五”（啊，他俩什么时候才能明白他们是天生一对？），一个在警察局的密友，斯特莱克曾在战争中救了他的命。不过罗琳给这些老套路赋予了新元素。比方说，罗宾不再是斯特莱克的老朋友或前女友，她和斯特莱克在《布谷鸟的呼唤》中初遇时是个年轻的临时秘书。

斯特莱克本人一开始可能很像我们经常遇到的那种形象——一个多思、受过伤害的侦探，战争中受的伤改变了他的生活、经济在崩溃边缘，前不久又失去了多年女友——但他身上有一种乐观主义，这非常令人喜爱，也让人耳目一新。尽管他在街上一瘸一拐地走着，时常都很痛苦。“斯特莱克是独一无二的，不仅是因为他的身材，也因为他并不觉得生活一直在打击他，把他打到人事不省。”

斯特莱克还有一个特点是很多伟大的虚构侦探都具有的：他是个好伙伴。

书中有很多思考，诸如名誉（斯特莱克是摇滚明星约翰尼·洛克比[Jonny Rockeby]的私生子）、媒体（这本书一开头就写了英国电话窃听丑闻，包括罗琳在内的很多名人都身陷其中）、图书市场（奎恩的妻子谈起丈夫的书卖不动：“完全要靠出版商来推动。他们从不让他上电视，或者提供他类似的机会”），当然还有电子书和数字出版时代了。

但罗琳最深刻辛酸的观察还要算是对婚姻和恋爱关系的失望。可爱的罗宾和一个名叫马修的讨厌鬼订婚了，但她看不到斯特莱克和读者们所能看出的东西——“她和马修在一起时的状态完全不是她自己。”斯特莱克想起自己姊妹的婚姻，还有那些有着相似婚姻的人，不禁思忖，这是一条通往“市郊常规生活的漫长队列”。他的寻找失踪配偶的私家侦探工作让他哀叹“背叛与幻灭是冗长乏味的变奏，为他带来永无穷尽的客户”。他看到长期受苦的妻子们保持着“故意盲目的忠诚”，以及那些声称爱着男性作家们的女人虚假的“英雄崇拜”。他的姊妹问他能够忍受那冤家前女友是不是“只因为她很漂亮”，斯特莱克的回答诚实而可怕：

“的确有帮助”。

如果我们知道这些观察来自一位明星女作家，而不是一个几乎没有名气的男作家，会不会觉得它们更有分量？我觉得是这样。

这本书并不完美。它稍微有点冗长，对疑犯的质询愈来愈啰嗦。有时候读者会觉得罗琳过于努力摆脱霍格沃茨。大堆脏话有点像叛逆的青少年好不容易得到自由。

有些人会说，从没有任何一本童书像哈利·波特这样改变了出版界，在这里罗琳做的事正相反，她在努力建设。《蚕》是一本文笔极佳、极具娱乐性的读物，以传统英国犯罪小说的面目出现，没有打破任何常规，罗琳似乎也知道这一点。罗伯特·加尔布雷思可能会骄傲地加入塔娜·法兰琪（Tana French）、伊恩·兰金（Ian Rankin）、薇儿·麦克德米德（Val McDermid）、约翰·康诺利（John Connolly）、凯特·阿特金森（Kate Atkinson）和彼得·罗宾森（Peter Robinson）等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犯罪小说作家的行列，但她不会超越他们。不过，能跻身这些作家的行列已经是很高的荣誉了。

随“罗琳”的名气而来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销量、金钱和关注。但这并不是她所追求的。至于坏处——这也正是她使用化名的原因——就是讲故事确实需要一点匿名性。就算无法彻底享有，罗琳也理应获得这样的机会。我们不能忘记她的名气，但从大一点的角度来说，我们读者获得的东西更多。如果我们注意到作者的身份，就会理解到书中观点的讽刺之处；如果我们忘记作者的身份，就能体会到一种避世的神秘感。不管怎样，书中虚构的出版商丹尼尔·查德说得对——“内容为王”，就这一点而言，J·K·罗琳和罗伯特·加尔布雷思都赢了。

Harlan Coben 最新作品是《想念你》（Missing You），他的最新少年小说《找到》（Found）将于今年秋天出版。

翻译：董楠

在一场军事政变中阅读柏拉图

STACEY D'ERASMO 2014 年 07 月 01 日

罗贝托·波拉尼奥（Roberto Bolaño）于 2003 年逝世，享年 50 岁，他的作品中有很多尖刻的欢乐，比如他认为文化是个婊子，特别是文学文化。面对政治压迫、巨变与危险，作家们依然迷恋文字，对于波拉尼奥来说，这是崇高感与黑色幽默的源泉。在他的小说《荒野



侦探》(The Savage Detectives)中,两个热心的拉丁美洲年轻诗人一直都未失去对纯净艺术的信念,不管年龄增长,生活与政治发生变迁。他们有时很可笑,但他们一直都有英雄气概。但在他那非凡的、令人不安的中篇小说《智利之夜》(By Night in Chile)中,他问我们,也扪心自问:当军政府在地下室拷问他人的时候,知识分子精英能写诗,能绘画,能讨论先锋戏剧中更精妙的东西,这一切究竟有什么意义?文字没有国界、没有政治倾向;是任何想要成为主人者都能召唤出来的精灵。波拉尼奥的精灵以仿佛能切断读者双手般的犀利反讽发问:我们是不是太容易就在艺术中找到安慰,这个世界忙着对生活中真实的人们做出真实残酷的事情,而我们是不是太容易就把艺术当做麻醉、借口与隐藏之地了?在一场军事政变中阅读柏拉图究竟是一种勇敢,还是别的什么?

《美洲纳粹文学》(Nazi Literature in the Americas)是一部顽皮的、杜撰出来的百科全书,里面记载了想象出来的纳粹作家和文学风潮领头人,书中波拉尼奥如同在挥舞一把犀利、扭曲的刀子。他仿佛博尔赫斯(Borges)爱冷笑的淘气儿子,小心翼翼地创造出一张严密的,由极右文学家与美文创作者构成的大网,对于他们来说,希特勒意味着美、真理与伟大的失落希望。《美洲纳粹文学》由一系列人物速写组成,是虚构的南北美洲作家们的生平简史,还有参考书目和二流人物的传记书目为它提供相互参照和补充,但生活里很容易找到这样的人。他们并不是《金牌制作人》(The Producers)中踢着正步的漫画式人物,而是极度微妙、深刻、真实可信。波拉尼奥创造出的人物就像雷尼·瑞芬舒丹(Leni Riefenstahl)一样,信奉浪漫主义美学,有古典和新平民审美,讨厌“不和谐”,潜意识里认为现代世界是大错特错的——比如说,他们觉得孩子们“被低等种族偷窃和养育”,觉得在第四帝国统治之下,更好的世界近在眼前。书中没有提到犹太人和其他不受欢迎的人;也没有集中营;“二战”顶多只是已经过去的东西。相反,波拉尼奥一本正经地叙述纳粹作家们无穷尽的想象,他们一直顽强对抗着不利于自己的世界史,他们特立独行地写着无人阅读、无人评论、基本无人关注的书籍。他们是失败者,但又以惊人的热情,坚定不移地对抗他们是失败者这个事实,同时还不断驳斥伏尔泰(Voltaire)、卢梭(Rousseau)和萨特(Sartre);他们用诗歌为墨索里尼辩护、他们的小说哀悼神性的衰亡;他们结成雅利安文学社团。和瑞芬舒丹一样,他们在特定形式的对称与秩序中发现至上之美,这种对称与秩序人们只有在事后才觉得是法西斯主义无疑。他们有一种既可怕又顽固的幻觉,认为自己不能放弃。

换言之,他们是作家。如果用“文体诗”取代“法西斯”,这些虚构人物的生命轨迹就和波拉尼奥熟悉的那些真实生活中忙碌的作家们没什么两样。然而在《智利之夜》中,波拉尼奥剖析出虚伪和坏的信仰是易变而残忍的(主角是一个道德败坏、与军政府合作的神父),而在这里,他心中作家的一面让他情不自禁地去浓墨重彩、栩栩如生地详尽描写这些失落的灵魂与他们的可笑行为;而且他似乎无法彻底否定他们。作为一个旅伴,他或许太了解如何在破损的书页上营造幻想的世界,以此抵御真实世界坚固不移的价值观。想象中的人物埃内斯托·佩雷斯·马松(Ernesto Pérez Masón)努力创作他的中篇小说,称之为“一出性幻想,也是激烈的反美狂想,主角是艾森豪威尔将军与巴顿将军”;神秘的美女达妮埃拉·德·蒙特克里斯托(Daniela de Montecristo)热爱“二战”期间的意大利和德国将军们,写了一部名叫《亚马孙人》的史诗小说;不知疲倦的剽窃者马克斯·米雷巴莱斯(Max Mirebalais)想把纳粹和黑人传统文化自豪感结合起来。这些人信奉凶残的政治哲学,这是他们与其他任何时代、任何地点的作家们之间的唯一区别。波拉尼奥写道,文学“是暴力的一种隐秘形式,是通往名望的通行证,在某些年轻而敏感的国度,可以掩盖不择手段挤进上流社会者的出身”。

谁说文学对历史没有影响力？波拉尼奥肯定不这么认为——对于他来说，文学令人不安地变化多端，是一种无关道德的力量，有着自我创造、自我辩解和自我神化的神秘能力。他认为，编纂神话的人确实非常重要。比如说，如果希特勒胜利了，这本百科全书中并非完全荒诞的故事会成为文学史上盛行的故事。“纳粹诗歌”是一种矛盾修辞吗？波拉尼奥认为，绝对不是。相反，它是非常有可能的。

Stacey D'Erasmio 上一本小说是《海马年》。

翻译：董楠

除鲍勃·迪伦，他们的人生别无他物

JANET MASLIN 2014 年 05 月 22 日

2012 年发行专辑《暴风雨》（*Tempest*），接受《滚石》（*Rolling Stone*）采访时鲍勃·迪伦（Bob Dylan）说得好：“为什么人们谈起我的时候非得疯疯癫癫的？”自从迪伦开始吸引疯狂拥趸以来，已经有 50 多年的时间过去了，他又得面对一种更凶猛、更危险的迷恋者，是他之前未见过的——他们是拥有社交网络的歌迷，拥有电脑的学者；他们成群结队，可以追溯到他做的每件事，他说过或唱过的每一个字。“迪伦学家”（*Dylanologist*）曾经是一个嘲笑的字眼，用来称呼一位专门去翻迪伦家垃圾桶的自封的“专家”，如今它虽然还没被收入字典，但至少在人们口头已经有了更广泛的涵义。

如今在迪伦崇拜者们的圈子里有了这样一本书。《迪伦学家》（*The Dylanologists*）的作者大卫·金尼（David Kinney）本身是一个热衷迪伦崇拜的人，但书的开篇题词却承诺一个理性的角度（“歌迷：你不知道我是谁，但我知道你是谁。鲍勃·迪伦：那就这样吧。”）。全书以朝圣者访问明尼苏达州希宾小镇的无辜场景作为开头，这里是罗伯特·齐默曼（Robert Zimmerman）的故乡，1959 年他逃离了这里，重新塑造了自己的形象，不再是原本那个家具店老板的儿子，一个中产阶级犹太小孩，并给自己重新起名为“鲍勃·迪伦”。这些朝圣者们来到这里，正好撞见迪伦回家参加兄弟的岳母的葬礼。

后来发生了什么？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是金尼借这个机会描写了迪伦崇拜者们的几个不同阶层，有些歌迷专吃樱桃派，因为迪伦也爱吃樱桃派；有些人连迪伦的曾外祖母的名字都知道（她叫“莉巴”，一家名叫“齐米”的游客饭馆里用黄色灯泡拼出了这个名字）；还有个人买下了两栋齐默曼家早期住过的房子，里面有小鲍比坐过的高凳子。这些故事纯真无辜，但并不是特别有意思。

然后金尼举例说明，鲍勃·迪伦自己也干过英雄崇拜之类的事。《迪伦学家》中写道，有人看见迪伦去约翰·列侬（John Lennon）的童年故居，英格兰利物浦的门迪普斯旅游，还打听去“草莓田”怎么走。还有人说他曾经在太阳唱片公司亲吻埃尔维斯·普莱斯利（Elvis Presley）1954年7月5日录制《没问题》（That's All Right）时所站的地方。所以我们大家都有音乐偶像。无非是大多数人并不让这些偶像改变我们自己的生活。

但这本书中的迪伦学家们都是金尼所能找到的最执迷的人，而且书中往往令他们的深沉感情本身成为一种意义。书中一个叫彼得的12岁小孩在1963年的夏天发现了迪伦，他就此“沉浸在迪伦辞藻的深井之中”。这个孩子如今已经是“步入60岁的老人，满面皱纹，头发花白，但他依然没有喝干这口井中的水。”

书中大部分受访者（他们自我推销的意图本文中无需多提）对迪伦大量作品中的某些方面或许多方面都拥有渊博的知识。但他们出名却不是因为这个。就这一点而言，14岁那年，彼得援引迪伦的金句，抨击父母“别去批评你们不理解的东西”，这实在是无法反驳。不久后，彼得被送去看心理医生，他带去了迪伦的《席卷而归》（Bringing It All Back Home），让医生听《一切都很好，妈妈（我只是在流血）》（It's All Right, Ma[I'm Only Bleeding]）这首歌，说“这就是我的感受”。对于那些不如迪伦本人那样能言善道而又言辞犀利或令人困惑的人来说，迪伦堪称他们最好的拐杖。

迪伦学家们热爱迪伦那种令歌词能够表达几乎任何想法的能力。随着迪伦的事业生涯不断延续，也有些人开始在追随他巡演途中结下了交情。他们放下手头的一切事情（通常不是什么大事）去看一场又一场的迪伦演唱会，如果有必要就结交朋友，花无数时间讨论每场演唱会之间的不同。购买金尼这本书的人很可能在某个时期都干过这样的事情，能够理解其中的诱惑。

但迪伦还在不停地巡演、巡演。于是一种新的歌迷和编年记录者诞生了——完美主义者，也就是那些收集每场演出所有细节的人。他们之中有些人——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米奇·布兰克（Mitch Blank），本书中最可敬的人物之一——为音乐史做出了具有重大价值的贡献（因为他那详尽无遗的收藏和纪录，布兰克在马丁·斯科塞斯[Martin Scorsese]的迪伦纪录片《没有回家的方向》[No Direction Home]中被誉为“魔幻般的收藏家”）。还有一些人赞美盗版和偷录，为自己能够想办法把录音设备偷偷带进演唱会，把每场演出都偷偷录下来而感到骄傲。读了这本书，读者就能学会怎样把照相机镜头藏在带活底的咖啡保温杯里带进场地。

本书的重磅炸弹还在后面，是通过迪伦学家们的网站发现的。迪伦的事业生涯开始之初，他没准就想到将来学者们会花费几个世纪的时间探索他作品中那些模糊的引用，理清他随心所欲地把各种事物联系在一起的逻辑。如今，只要打几个字搜索就能暴露出所有的丑事——迪伦是个喜欢巧取豪夺的艺术家，他从大量、各种资源中汲取素材，就像此前的很多伟大的、巧取豪夺的艺术家们做过的一样。

但是以前那些伟大的艺术家们却没有无数擅长谷歌搜索、自以为是的狂热崇拜者们跟在身后。迪伦那本惊人优美的自传《编年史，第一卷》（Chronicles Volume I，中译《像一块滚石》）已经被检查者们拆解成无数块，以至于他得正面回答这个关于“抄袭”的问题。他的立场是：一切事物都有自己的来源，他只是试着去将亨利·蒂姆罗德（Henry Timrod）

19 世纪用自己的方式再加工而已。乔纳森·利瑟姆（Jonathan Lethem）曾经写过一篇关于创造性借鉴的文章，热情地为迪伦辩护，然而这篇文章本身也是由各种来源仓促堆砌而成。

迪伦学家们陷入了“这下我可抓住你的把柄了”的狂热之中，这是一种悖论，正如迪伦在纪录片《别回头》（Don't Look Back）里曾经公开抨击《时代》杂志记者，但他显然又需要《时代》杂志来唤醒自己在纽约第一年生活的记忆。迪伦学家们的故事中萦绕着这样一种无处不在的忧伤：那些人宁愿活在鲍勃·迪伦的生活里，也不愿去过自己的人生。

本书由“行行”整理，如果你不知道读什么书或者想获得更多免费电子书请加小编微信或 QQ：491256034 小编也和结交一些喜欢读书的朋友 或者关注小编个人微信公众号 id：d716-716 为了方便书友朋友找书和看书，小编自己做了一个电子书下载网站，网址：[www.ireadweek.com](http://www.ireadweek.com) QQ 群：550338315

《迪伦学家：鲍勃世界的冒险》（The Dylanologists）

大卫·金尼著

241 页，西蒙与舒斯特出版社，25 美元。

翻译：董楠

1、小编希望和所有热爱生活，追求卓越的人成为朋友，小编：QQ 和微信 491256034 备注书友！小编有 300 多万册电子书。您也可以在微信上呼唤我 放心，绝对不是微商，看我以前发的朋友圈，你就能看得出来的。

2、扫面下方二维码，关注我的公众号，回复电子书，既可以看到我这里的书单，回复对应的数字，我就能发给你，小编每天都往里更新 10 本左右，如果没有你想要的书籍，你给我留言，我在单独的发给你。

3、为了方便书友朋友找书和看书，小编自己做了一个电子书下载网站，网址：<http://www.ireadweek.com>

4、小编自己组建的 QQ 群：550338315



扫此二维码加我微信好友

扫此二维码，添加我的微信公众号，  
查看我的书单